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26期（民國113年12月），83-13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韓戰中的何世禮
——遊說麥克阿瑟與鞏固華僑政治認同*

李　戡**

摘　要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後，蔣介石對戰局保持密切關注，試圖利用機會派兵參戰、反攻中國大陸。最廣為人知的是，蔣介石曾計劃派出三個師、共計 3 萬 3 千名兵力參與韓戰，而剛上任的駐日代表團團長何世禮，則被賦予和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交涉的重任。儘管這項計畫多次被美方考慮後又拒絕，何世禮仍在韓戰局勢最緊繃的階段，和盟軍總部建立了緊密聯絡。在朝鮮半島之外，國、共兩黨亦在日本展開較量，一為中共欲取代中華民國在盟國對日委員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中的席位，在明知希望渺茫的情況下，仍委派周士第出任代表，何世禮則展開反制；二為韓戰爆發加劇留日華僑政治認同上的分歧，左傾思想繼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再次高漲，何世禮一改駐日代表團過去管理華僑的消極作風，採用強勢手段控制華僑與留學生的政治表態，在其任內暫時抑制左傾浪潮的蔓延。本文利用〈何世禮日記〉與相關中西方史料，探討何世禮在韓戰中的角色。

關鍵詞： 韓戰、駐日代表團、何世禮、蔣介石、麥克阿瑟

---

*　收稿日期：2022 年 12 月 2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一、前　言

蔣介石計劃派兵參加韓戰，以及 1950 年 7 月 31 日麥克阿瑟訪臺之行，在英語世界的學術研究成果中經常被提及。[1]在中國大陸以韓戰爲主題的官方研究中，蔣介石派兵援韓並未引起重視，其重要性甚至不如 1953 年 7 月 16 日國軍對東山島發起的突襲作戰。[2]近年來，隨著中文史料接連開放，兩岸學者在蔣介石派兵援韓的細節上，逐漸發掘更多細節。在臺灣，劉維開於 2000 年發表〈蔣中正總統對韓戰及相關問題的看法與政策——民國三十九年〉、〈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維鈞在韓戰初期中美外交中的角色〉兩文，2008 年進一步使用《蔣中正日記》等史料，發表〈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一文，分別從蔣介石與顧維鈞之視角，探討兩人在韓戰中的角色。[3]在中國大陸，1990 年孫宅巍〈台灣當局與朝鮮戰爭〉、2017 年浙江大學王樂娜的碩士論文〈台灣當局與朝鮮戰爭〉、2020 年馮琳〈朝鮮戰爭時期圍繞出兵援韓問題的台美交涉〉、侯中軍〈朝鮮戰爭期間台灣的應對及其影響〉，皆根據中文史料，介紹「臺灣當局

1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London: Pan Macmillan, 1988), p. 67; Peter Low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6), pp. 178-180; Carl Berger, *The Korea Knot: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pp. 111, 116-117; Edgar O'Balance, *Korea: 1950-1953* (London: Faber Press, 1969), pp. 34, 46;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67; Sheila Miyoshi Jager, *Brothers at War: the Unending Conflict in Kore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3), p. 80; David Cheng Chang,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83-84.

2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抗美援朝戰爭史（修訂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下卷，頁 489-490。

3 劉維開，〈蔣中正總統對韓戰及相關問題的看法與政策——民國三十九年〉，《近代中國》，期 137（2000 年 6 月），頁 90-100；劉維開，〈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維鈞在韓戰初期中美外交中的角色〉，《近代中國》，期 140（2000 年 12 月），頁 39-57；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輔仁歷史學報》，期 21（2008 年 12 月），頁 253-282，後另收入陳立文主編，《蔣中正與民國外交 II》（臺北：中正紀念堂，2013），頁 39-73。

的三次援韓之議」。[4]整體而言，中文學界的研究成果，多數從中方視角出發，未能充分注意美方對運用蔣介石派兵援韓的時機點與其因應，以及關鍵人物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立場的演變。鑒於蔣介石與麥克阿瑟就派兵援韓的商討，幾乎都由駐日代表團團長何世禮負責，故本文透過何世禮的視角，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探索更多關鍵細節。

駐日代表團成立於 1946 年 5 月，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蘇聯和英國共同佔領日本，積極參與戰犯審判和向日本政府索取賠償。駐日代表團團長亦爲盟國對日委員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中的中國代表，向麥克阿瑟出謀劃策。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代表團在日本的處境日益艱辛，其合法性受到中共當局和蘇聯不斷挑戰。何世禮於 1950 年 6 月接任團長後韓戰爆發，中共立刻宣布將派人取代其在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席次。關於中國代表權的爭議，以往研究悉數探討聯合國的案例，皆未曾注意到盟國對日委員會的情形，本文則透過中、英文史料介紹此案例，並突出臺北方面的不安與何世禮的泰然自若。同時，韓戰的爆發亦加劇代表團內部和僑界的左傾浪潮，爲駐日代表團在日活動構成不小威脅。在過往研究方面，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戰後日本神戶華僑社會的變遷〉和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兩文，皆注意到戰後日本華僑和臺灣留學生的左傾傾向，以及駐日代表團的防堵措施。[5]本文則以林以文和康啓楷爲案例分析，具體探討何世禮強勢介入華僑政治表態的手段與成效。整體而言，韓戰期間何世禮聯繫麥克阿瑟、捍衛盟國對日委員會代表權，以及遏制僑界左傾浪潮，實爲與韓戰進程息息相關、彼此環環相扣的事件。透過研究韓戰期間何世禮的角色，亦能從另一視角研究 1950 年代初期冷戰格局下中華民國政府的艱難處境與生存之道。

---

4 孫宅巍，〈台灣當局與朝鮮戰爭〉，《社會科學戰線》，1990 年第 4 期，頁 220-225；王樂娜，〈台灣當局與朝鮮戰爭〉（杭州：浙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7）；馮琳，〈朝鮮戰爭時期圍繞出兵援韓問題的台美交涉〉，《社會科學研究》，2020 年第 1 期，頁 167-179；侯中軍，〈朝鮮戰爭期間台灣的應對及其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頁 70-86。

5 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戰後日本神戶華僑社會的變遷〉，《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2（2011 年 6 月），頁 147-195；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2（2012 年 6 月），頁 151-192。

二、韓戰爆發後蔣介石的應對

1950 年 6 月 25 日清晨，北韓軍隊跨過 38 度線進攻南韓。近在東京的駐日代表團團長何世禮，直到當晚六點才從新聞記者魏景蒙口中得知消息，在日記中寫道：「六時餘接魏景蒙君電話，始知南北韓已於今晨發生戰事，聞上午九時半即已有廣播，而本團軍事組及新聞小組均尚不知，使余頗覺不滿。」[6]隔日何世禮詢問第一組組長曹士澂爲何未掌握相關消息，曹回答：「余只管日本情報，至本組尚主管何種業務則尚不知」，何在日記中評論：「此種幕僚似尚不夠水準也。」[7]與此同時，戰事的爆發促使正在日本訪問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何世禮與受蔣介石委派「巡訪歷邦」的董顯光會面，會談大意如下：

（1） 杜問南韓戰事發生乃至失守，於臺灣有何影響，禮答以其失守之情況而異，如南韓抵抗及有人支持，當然臺灣士氣提高，如同捷克相類之失守，則當然影響極壞……

（2） 杜問共軍最近的攻臺有何積極行動，禮答最近我由臺來迄一星期前所得情報，共軍兵力無大轉動，如由上海附近登船攻臺，則沿途損失必大，如轉移數十萬大軍至閩海岸，亦非易事，所以似無即動徵象，杜答一星期前消息恐不可靠，如我一星期前在韓，均說情況穩定，而昨已大規模。[8]

這場談話僅涉及韓戰爆發對臺灣的影響，並未提及任何臺灣派兵的可能性。27 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稱「我已下令第七艦隊保護臺灣免受攻擊，我也要求島上的中國政府停止針對中國大陸的海空行動，而第七艦隊會確保它實

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6 月 25 日。〈何世禮日記〉一共六冊，時間段涵蓋 1950 年 6 月 11 日至 1952 年 7 月 26 日，其中詳細記載何世禮擔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期間的所見所聞，如與盟總官員、其他國家駐日代表團人員、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員、日本政界人士的交往，以及與臺北若干重要人士的互動情況。該日記由何世禮贈予筆者父親李敖。

7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6 月 26 日。

8 「何世禮電王世杰」（1950 年 6 月 26 日），〈對美國外交（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以下簡稱《蔣檔》，並略藏地），典藏號 002-080106-00031-002。

現」。[9]隔日何世禮與駐日代表團討論此聲明，決定 30 日會見盟軍總部政治顧問席波（William J. Sebald），請其解釋如下疑問：

A. 今日杜魯門總統聲明與元月五日聲明有何變化。

B. 是否逼我方退出國聯。

C. 是否反共動作一律停止，因有次述各問題發生

1. 我之海空軍佔優勢，是否將我方優勢凍結。

2. 關閉政策是否停止。

3. 大陸人民飽受共黨痛苦，希望我方回去，目前令彼等失望。

4. 使一切游擊隊被逼停止。

5. 前方有十萬人，是否等待犧牲不能受接濟。

6. 共軍對付金門等前方據點可以大量集中部隊作攻擊準備，我方均不得行動。

7. 臺灣士氣原極旺盛，此次忽遭凍結，影響甚鉅，可能發生上次和談結果。[10]

6 月 30 日會面中，席波並未針對每項問題回應，僅稱：「最少可斷言，此次宣言，對臺灣是好意」，並承諾將請麥克阿瑟注意。[11]杜魯門的聲明，明確阻止蔣介石對中國大陸展開軍事行動，對蔣介石而言，即使無法對中國大陸發起反攻，派兵參與韓戰仍不失爲次優選擇。早在 26 日，蔣介石已萌生派兵赴韓作戰的構想，恰巧 27 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會員國向南韓提供軍事援助，29 日蔣介石接獲通知後，下令駐美大使顧維鈞與何世禮分別將派兵援韓的構

9 “Statement on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50, p. 1;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Joint History, 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98), Part One, p. 41.

10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6 月 28 日。第七點所指的和談，應爲 1945 年 12 月至 1947 年 1 月間的馬歇爾調停（Marshall Mission）。

11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6 月 30 日；「何世禮函陳誠」（1950 年 7 月 1 日），〈石叟叢書—友聲集（第一冊）〉，《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8-010108-00014-048。

想轉告華盛頓美方與駐日盟軍總部。[12]根據美國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的報告，顧維鈞表示中華民國政府「無法派遣海空軍，但準備提供當時有最好裝備的三個師大約 3 萬 3 千名兵力，不過沒有足夠的運輸能力將這批士兵送至韓國」，另外顧維鈞也告知美方，駐日代表團團長已和麥克阿瑟接洽此事，因為「任何派去的軍隊都將由他指揮」。[13]美方獲知蔣介石提議的隔天，立刻在白宮召開的軍事會議中展開討論，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和參謀長聯席會議（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表達反對，理由是使用蔣介石軍隊會直接導致中共介入。除此之外，蔣介石軍隊的作戰實力與南韓軍隊相差無幾且無法自行運輸，故若要由美國海軍協助運輸，不如將該資源用在運送駐日美軍前往韓國。最終，杜魯門同意拒絕這項提議。[14]根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官方歷史，7 月 1 日蔣介石透過駐美大使館管道被「委婉地告知」美方的拒絕。[15]

與此同時，何世禮也將此事轉達麥克阿瑟，但與顧維鈞不同的是，何世禮被要求追加詢問麥克阿瑟，「請麥帥告我以需要之陸軍確數，以及美方對此項派遣軍可能給予之便利」。6 月 30 日下午，外交部部長葉公超催促何世禮「立即晉見麥帥」，何世禮即請席波轉達。[16]據美方文件記載，麥克阿瑟得知此提議後，立刻告知華府他對「接受中華民國政府提供兩個師」的興趣，而此電報

12　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收入陳立文主編，《蔣中正與民國外交 II》（臺北：中正紀念堂，2013），頁 46-48。關於 6 月 27 日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參見 Courtney Whi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6), p. 324.

1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Merch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9,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 Korea*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239.

14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51.

15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61.

1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6 月 30 日。

的收發時間爲美國時間 30 日清晨五點，即白宮否決此提議的數小時前。[17]若算上美國東岸與日本的時差，麥克阿瑟傳送該電報之時，即爲日本時間傍晚，可證在 6 月 30 日下午透過席波得知蔣介石的提議後，麥克阿瑟並未花過多時間思考，便直接表露強烈興趣。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也預想中華民國政府會直接找上麥克阿瑟，因而特別提醒麥克阿瑟，「接受和拒絕外國政府提供軍事援助的決策權是在華盛頓的最高層」。[18]除了東京和華盛頓，蔣介石又要求駐韓大使邵毓麟接洽韓國總統李承晚。邵毓麟此刻已率大使館人員撤往東京，人員安置在駐日代表團宿舍內。30 日，何世禮與邵毓麟收到蔣介石指示：「駐日代表團何團長，駐韓大使館邵大使：密。韓國遭受侵略，中韓誼屬手足，自應援救危局。中國政府茲特決定先以陸軍三個師，運輸機二十架，援助韓國，除飭整裝待發並飭蔣代表向聯合國祕書長提出此項建議外，即希分別通知麥帥及李總統，並希將辦理情形具報爲要。」[19]

蔣介石似乎對美方接受其方案一時信心十足，據美國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文件，在 6 月 30 日之前，大約 5 萬名士兵已向基隆和高雄兩港集結，等待啓航命令。[20]但直到 6 月 30 日，蔣介石才與參謀總長周至柔和國防部長郭寄嶠討論援韓部隊之編成，決定「以劉廉一軍爲主幹，再附以八十軍之二０一師充實之」。[21]然而，蔣介石似乎還未得知白宮 6 月 30 日的決議。而麥克阿瑟受到華府的指示後，很大程度也限縮了他和何世禮的來往。

---

17 Michael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9.

18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61.

19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頁 169。

20 “Preparation of Nationalist Military Units for Korean Aid,” July 12, 1950, General CIA Records, the United States, CIA-RDP82-00457R005200700001-0.

2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冊 9，頁 516。據邵毓麟回憶：「據事後內定爲我國援韓派遣軍司令官，原任我國第六十七軍軍長劉廉一將軍告我：援韓派遣軍原定初步一個軍，由二０一、六十七、十八等三個作戰有功的榮譽師組成，另裝甲兵一個旅，飛機二十架。派遣軍司令官由他擔任，該軍政治部主任，亦已內定爲當時我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胡偉克將軍云云。」見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 185。

7 月 1 日，已退役的第七艦隊司令柯克（Charles M. Cooke Jr.）從臺北抵達東京，兩人準備一同在中午會見麥克阿瑟談論派兵援韓一事，據何世禮日記，柯克稱「麥帥不知此事」，但何世禮對此說法感到懷疑，即敏銳查覺「斯言莫辨眞僞，或麥帥不欲與我官方接觸，亦未可知」。當天下午，韓國駐日公使金龍周來訪，「云接韓大總統李承晚電話，請余轉總統蔣，此次中國願予協助，深爲感謝，同時令其見麥帥，希望我國出兵，但麥帥未予接見」。同樣在當天下午，席波告知何世禮，爲了臺灣派兵援韓一事，「已有數人請見麥帥」，但均不得其門而入。何世禮認爲「余更認爲麥帥關於此問題，在未得到華府訓令前，必不敢見我官方人員」，並在當晚針對派兵援韓一事，另外寫一公文發至盟軍總部。[22]

顯然，華府 6 月 30 日發給麥克阿瑟的指示（若計算時差，麥克阿瑟東京時間 7 月 1 日一早即收悉），讓後者在 7 月 1 日拒見上門遊說的訪客。然而，臺灣方面似乎對華府的決議毫無所悉，2 日下午，葉公超再度堅持何世禮拜訪麥克阿瑟，何世禮則認爲：

> 1. 麥帥此時實有不便接見外國官員之處，蓋美方對我派兵問題始終未感特別興趣也。
> 2. 昨此間報紙已發表關於此事業由本團與盟總在東京談判中，故一切交涉深受影響。
> 3. 余認為我可存此表示，藉以試探，不應進逼過甚，有失使節顏面，惟依余推測，葉部長始認華府業已接受，而余似缺乏能力，可以晉見麥帥。[23]

可見，臺北方面與何世禮的認知存在落差，葉公超認爲華府已經接受臺灣派兵援韓，而有埋怨何世禮辦事不力之意。同日，席波收到何世禮的公文，隨後請示上級，第十軍軍長阿爾蒙德（Edward Almond）將軍認爲後勤問題無法解決，

22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1 日。
23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2 日。

麥克阿瑟則認爲該由華府決定。[24]3 日，葉公超再度催促何世禮略過席波，直接見麥克阿瑟，何世禮日記中寫道：「葉部長來電，謂凡政府請兄向麥帥接洽事，不必先與 Sebald 接洽，不知此君性情甚較暴躁，而與余相交甚爲融洽，外交部不明此間情形，乃欲令余開罪於不應開罪之人，殊足怪也。」[25]當天晚上，盟總告知隔天中午與麥克阿瑟會面，何世禮認爲：「由此足徵外部估計錯誤，余之估計正確，此種情形不在當地即所不知，未可完全憑諸臆斷也。」[26]7 月 4 日，何世禮在 6 月 12 日以後再次見到麥克阿瑟，麥克阿瑟表示他視杜魯門的聲明爲他和蔣介石的勝利，畢竟麥克阿瑟始終認爲臺灣必須受到保護，以免落入中共手中。麥克阿瑟更首次透露訪問臺灣意願，但因爲戰事吃緊，行程必須延後。[27]據席波 7 日呈給艾奇遜的電報，麥克阿瑟要何世禮回臺後當面向蔣介石轉達其意見，包括加強臺灣的防衛能力、現階段臺灣軍隊不應派往韓國，以及希望親自訪問臺灣獲取第一手消息。[28]

現有史料顯示，從韓戰爆發後數日，麥克阿瑟對臺灣的軍事防守能力抱有極大關注。麥克阿瑟並不掩飾他計劃訪問臺灣的意圖，他告訴美國陸軍參謀長科林斯（J. Lawton Collins）將在韓國戰局穩定後訪問臺灣。[29]不久，麥克阿瑟指示其助手邦克（Laurence E. Bunker）通知何世禮，轉達同樣訊息。[30]蔣介石獲知麥克阿瑟訪臺意圖後，5 日指示何世禮詢問麥克阿瑟是否能在東京和他見

24 William J. Sebald, *With MacArthur in Japan: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p. 189.

25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3 日。

2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3 日。

27 「何世禮電蔣中正」（1950 年 7 月 4 日），〈對美關係（六）〉，《蔣檔》，典藏號 002-090103-00007-030。會面內容另見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3），頁 222。

2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Act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 (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7,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370.

29 J. Lawton Collins, *War in Peacetime: The History and Lessons of Kore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 271.

30 「麥帥致邦克函」(1950 年 6 月)，〈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01。

面，因為他正打算訪問南韓。同日，蔣介石又指示何世禮，詢問李承晚是否願意在韓國與他會面。[31]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記載：

> 十時半入府，麥帥正式通知其將來臺訪問，彼以為此次杜魯門之聲明，是余與彼第一次之大勝利，是彼在其本位一方面觀察，當然可以如此也。余接其通知，乃決定余先訪韓，轉日訪彼。以南韓戰局緊張，如彼離日來訪，心滋不安也。召見至柔、雪艇指示要務，審閱中美共同保衛臺灣作戰任務方案後，處理公文。聽取財政、經濟近情與辦法之報告，仍未得根本之道，但公教人員配給實物之實施，能見諸事實，是政治一大進步。下午午課後，入府召集經濟會談，約二小時之久方畢。發何世禮電二通，屬其轉告余訪韓、日也。[32]

何世禮認為時機不宜，故在 6 日覆電表示反對，並建議立即停止這些行動。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記載：「十時入府辦公，接何世禮來電，昨電訪韓、日事，尚未與麥帥接洽也。韓戰頗危，美軍在水原以南防線，已為韓共突破，並有一部被包圍也。」[33]儘管如此，何世禮又收到臺北要求繼續推展計畫的要求，故只能同意找負責情報部門的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將軍詢問。[34]果不其然，正如何世禮所預期，蔣介石與麥克阿瑟在日本會面的提議，因戰事吃緊為由遭到委拒。[35]根據何世禮的觀察，威洛比「認為臺灣現在不應如此，故不允轉達，恐受斥責也」。[36]

在獲悉威洛比拒絕向麥克阿瑟轉達這項提議後，蔣介石大為不滿，在日記中寫下：「麥帥參長對余訪韓、訪麥之舉，認為煩擾無禮，以其南韓軍事失利，

31 「蔣中正電李承晚」（1950 年 7 月 5 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三）〉，《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342-001；「蔣中正電何世禮」（1950 年 7 月 5 日），〈籌筆－戡亂時期（十五）〉，《蔣檔》，典藏號 002-010400-00015-011。

32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下略著者及編者），《蔣中正日記（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1950 年 7 月 5 日，頁 202。

33 《蔣中正日記（1950）》，1950 年 7 月 6 日，頁 202。

34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6 日。

35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頁 223。

3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6 日。

顯現其驚恐無措之神態，故對何世禮表示拒達麥帥，此乃美國將領輕浮無常之習性，決非麥帥本人之心神，故聞此不足爲異。」[37]儘管這項計畫遭到否決，但麥克阿瑟訪臺行程仍在規劃中。同日，何世禮返抵臺北研究相關細節，據蔣介石當天日記：「何回臺面告麥帥最後表示誠摯之意，且未因其第七艦隊司令來臺而變更其訪臺之決心。彼對余之信心，實爲美國惟一心交之知友也，可敬。」[38]7 月 10 日，何世禮晉見蔣介石，「談駐日代表團人事，及對麥帥聯繫辦法」。[39]14 日，蔣介石「指示何世禮團長對麥帥談話要旨四項」。[40]蔣介石在日記中，並未列出這四項內容，然而在何世禮當天日記中，談話重點爲徵詢盟總同意轟炸福州義序機場一事。[41]15 日何世禮返回東京後，立刻向盟總提交一份轟炸福州機場的備忘錄。[42]三天後，麥克阿瑟告知何世禮，美方拒絕這項提議。[43]

相較於蔣介石的急躁，何世禮顯得沉穩許多，他一方面耐心等候麥克阿瑟的通知，一方面爭取機會，提升中華民國政府在東京的形象。例如，何世禮率領 74 名駐日代表團團員，爲韓戰前線的聯合國部隊士兵捐血，如報紙所載，何世禮本人「捐血 600 毫升」，且「20 位中國駐日代表團的女眷自願加入紅十字會爲前線士兵提供服務」。[44]何世禮的等待也收到效果，7 月 28 日麥克阿瑟約見何世禮，告知訪問臺北的細節，何世禮立即電告王世杰，強調「此次同來者全屬盟總最高級將領，我方一切，宜令彼等得到良好印象」，何世禮又草擬與麥克阿瑟討論要旨三點，分別爲「臺灣防守責任之劃分與中美間聯繫」、「金門馬祖兩島防守問題」、「充實我方海陸空軍實力問題」，何世禮另外提

37 《蔣中正日記（1950）》，1950 年 7 月 7 日，頁 203。
38 《蔣中正日記（1950）》，1950 年 7 月 7 日，頁 203。
39 《蔣中正日記（1950）》，1950 年 7 月 10 日，頁 206。
40 《蔣中正日記（1950）》，1950 年 7 月 14 日，頁 208。
41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14 日。
42 「何世禮電王世杰」（1950 年 7 月 15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03。
43 「何世禮電王世杰、周至柔」（1950 年 7 月 18 日），〈對美關係（六）〉，《蔣檔》，典藏號 002-090103-00007-063。
44 "Chinese Donate Blood," *Nippon Times*, July 28, 1950, p. 3.

醒「赴韓助戰問題，我不宜再度要求，但美方如詢及，我參謀總長應將我可供給之軍隊及武器予以說明」。[45]

三、麥克阿瑟訪問臺北

7 月 31 日早上六點，何世禮陪同麥克阿瑟搭機飛往臺北。根據美國空軍司令史崔特梅爾（George E. Stratemeyer）當天日記，同機乘客有“Joy, Struble, Ho, Almond, Whitney, Canada (CINCFE's physician)”，另一架飛機上有“Marquat, Willoughby, Wright, Eberle, Navy member, my Materiel (Alkire)”和第七艦隊成員等人。[46]抵達臺北後，麥克阿瑟受到蔣介石熱烈歡迎。[47]同日下午，中美雙方召開軍事會議。根據史崔特梅爾日記，在這場會議之後，麥克阿瑟單獨與美方人員召開會議，說道：

> 中國軍隊的組織結構很差，部署也不恰當。如果能夠組織一支大約75,000 到 100,000 人的部隊，無論是在計畫上還是實地部署上都安排妥當，並配備適當的指揮官，就能守住臺灣。我們的任務是立即派出一支由陸軍、空軍和海軍組成的聯絡小組，雖然我們不會直接指揮這些部隊，但我們會協助並指導，按照我們美國人的觀點來協助防禦臺灣。我們的部隊不會整合，但將採取平行協作的方式工作，以幫助提升島嶼的防禦能力。我們在臺灣的行動將僅限於防禦工作，我們會協助中國軍隊，但絕不涉及政治事務，我們的行動將完全專業。[48]

45　「何世禮電王世杰」（1950 年 7 月 28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04。

46　William T. Y'Blood, ed., T*he Three Wars of Lt. Gen. George E. Stratemeyer: His Korean War Diary* (Washington, D. 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9), p. 89.

47　Peter Low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179. 按，乘客中的“Ho”即何世禮；“CINCFE”即盟軍遠東司令部（C-in-C Far East）。

48　William T. Y'Blood, ed., *The Three Wars of Lt. Gen. George E. Stratemeyer: His Korean War Diary*, pp. 90-91.

麥克阿瑟訪臺之前，恐怕未曾想到中華民國軍隊防守臺灣如此不樂觀。儘管麥克阿瑟訪臺主要目的爲考察臺灣防衛能力，他或許也想藉此評估是否該接受蔣介石派兵參加韓戰的提議。但在這場會談之後，麥克阿瑟顯然完全打消這個念頭，轉而指望中華民國軍隊顧好臺灣的防守即可，如一位學者指出，「中美雙方同意共同配合防守臺灣，暫時擱置蔣介石 3 萬 3 千名士兵的提議」。[49]至於麥克阿瑟提及的聯絡組，威洛比在 8 月 3 日即請何世禮轉告臺北方面，他將派遣副參謀長福克斯（Alonzo P. Fox）將軍隔日率領 25 位官員抵臺調查。[50]麥克阿瑟也提議派遣戰鬥機到臺灣，但華府擔心這些戰機會被用來和中國大陸作戰。杜魯門要求麥克阿瑟不要逾越職權範圍，麥克阿瑟則向其保證，他「完全了解自己作爲戰區司令權限的限制，您不需擔心我會以任何形式跨越它們」。[51]

麥克阿瑟唐突的臺北行激怒了杜魯門總統，後者立刻派特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到東京會見麥克阿瑟。[52]哈里曼的東京行引起東京其他國家代表團的疑慮，英國代表團急欲了解其到訪的眞正目的，欲邀哈里曼會面未果。英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加斯科因（Sir Alvary Gascoigne）只得找上席波，要求提供更多訊息，諸如哈里曼是否來和麥克阿瑟討論臺灣問題，席波回答他一無所知。眼見無法獲得有價值的訊息，加斯科因對無從聯繫麥克阿瑟大爲不滿，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麥克阿瑟有時間會見蘭道夫丘吉爾（Randolph Churchill），卻沒時間見英國政府在日本的代表。」[53]如同加斯科因所預期，哈里曼和麥克阿瑟確實談到了臺灣問題，但未取得共識。麥克阿瑟始終對華

49 Carl Berger, *The Korean Knot: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p. 117.

50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8 月 3 日；Walt Sheldon, *Hell or High Water: MacArthur's Landing at Inch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 96.

51 Michael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pp. 194-195.

52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81.

53 Sir A. Gascoigne (Tokyo) to Mr. Dening, August 9, 1950, Foreign Office (Hereafter, FO) 371/84044,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United Kingdom. 蘭道夫丘吉爾爲前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之子，時任報導韓戰之新聞記者。加斯科因在另一份報告中表示，自 1950 年 6 月 15 日與麥克阿瑟會面後，直到 9 月底方再度會面。見 Thomas Hennessey, *Britain's Korean War: Cold War Diplomacy, Strategy and Security, 1950-53*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6.

府的中國政策不以爲然，認爲自己才是眞正了解「東方心理學」（Oriental psychology）的美國專家，且堅信華府應該將「處理蔣介石的任務交給像他這樣的專家」。[54]何世禮則認爲，儘管哈里曼與麥克阿瑟商談細節不得而知，但發現哈里曼離日後「麥帥與其幹部精神愉快，盟總各主管對援我物資態度仍甚積極」，推測麥克阿瑟已說服哈里曼，並要求臺北方面注意發表言論，以免增加麥克阿瑟的困擾。[55]

儘管麥克阿瑟的臺北之行並未動搖他不希望蔣介石派兵參戰的主意，但臺灣問題在韓戰的重要性仍不容小覷，而何世禮在東京重要性的提升，便是其中一個明證。在從臺北返回東京的航班上，麥克阿瑟直接邀請何世禮參加日後的韓戰盟軍作戰會報。[56]在何世禮的日記中，記載了各次會報的要旨，例如 8 月 23 日的會報上，麥克阿瑟與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海軍上將謝爾曼（Forrest Sherman）討論仁川登陸的細節。[57]中華民國並未參加韓戰，而何世禮卻能列席盟軍作戰會報，由此可見何世禮在麥克阿瑟心目中的地位。

8 月 18 日，何世禮安排顧維鈞與麥克阿瑟會談，麥克阿瑟則表示戰事關鍵在於「美軍反攻到達北緯三十八度時，聯合國是否擬主張由聯合國以和平方法某得統一韓國之解決」，若北韓軍隊不肯停戰，「結果必爲美殲滅淨盡」。[58] 9 月 15 日，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大捷，28 日收復漢城，蔣介石致電麥克阿瑟表示祝賀。[59]仁川登陸後，蔣介石立即試探以中華民國名義派出觀察員到朝鮮戰場的可能性，何世禮與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將軍討論此事，後者仍建議此事須由聯合國討論，盟總則會全力相助。[60]麥克阿瑟也告知何世禮，已有

54 Michael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p. 195.

55 「何世禮電王世杰」（1950 年 8 月 11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05。

5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8 月 1 日。

57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87;〈何世禮日記〉，1950 年 8 月 23 日。

58 「顧維鈞電蔣中正」（1950 年 8 月 18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05。

59 Courtney Whi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pp. 362-363.

60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9 月 25 日。

31 個國家要求派出觀察員到前線遭到拒絕，故難以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但若未來這些國家獲得許可派出觀察員，中華民國也可比照辦理。[61]

與此同時，何世禮在東京呼籲放棄「中立臺灣」的想法，因爲這將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得以進攻臺灣，而臺灣的空軍與海軍將受到嚴重限制。何世禮表示儘管自由中國已在臺灣立足，它仍有能力阻止解放軍進入韓國。[62]10 月 5 日，麥克阿瑟告知何世禮和董顯光，「38 線必須越過，而越過後一月內即可結束戰爭，截至目前爲止美國在韓兵力已足敷用，即使蘇聯或中共參加亦無以阻遏美軍之攻擊」。[63]麥克阿瑟的意思非常清楚，在戰爭初期局勢未明時，他考慮接受蔣介石派兵作戰的提議，惟始終得不到華府同意，現在戰局日漸明朗，麥克阿瑟樂觀地預測解放軍不會出兵干預，即便干預，也改變不了聯合國軍即將獲勝的局面。正是在這種樂觀評估的氛圍下，9 月 29 日華府同意麥克阿瑟跨越 38 度線。[64]

10 月 15 日，杜魯門在威克島（Wake Island）和麥克阿瑟討論韓戰局勢，並重申美國政府不進攻中國大陸的方針。[65]兩人同樣認定，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會參戰，即便參戰，麥克阿瑟預測：「美軍將在他們跨過鴨綠江的時候摧毀他們，且將是『軍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屠殺』。」[66]中華民國政府將這場會談視作評估杜魯門眞實態度的絕佳機會，新聞報導亦推測何世禮此時留在日本的目的是打聽會談消息。[67]獲悉此事後，何世禮對臺灣有關人士無法守密大感不

61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0 月 5 日。

62 〈何世禮在東京演說稱台灣「中立化」措施使中共「獲得利益」〉，《工商日報》（香港），1950 年 9 月 21 日，第 1 頁。

63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0 月 5 日；「何世禮呈蔣中正與董顯光晤見麥克阿瑟談話內容摘要」（1950 年 10 月 5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10。

6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shall)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Far East (MacArthur)," September 29,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 Korea*, p. 826.

65 Simei Qing,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4.

66 Dean Rusk, *As I Saw It*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91), p. 146.

67 〈杜麥之會成台灣生死關頭〉，《華僑日報》（香港），1950 年 10 月 16 日，第 1 張第 2 頁。

滿，遂於 10 月 18 日提出辭呈，但立即遭到挽留。[68]此時何世禮已察覺到，儘管威克島會議的氛圍仍算融洽，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分歧必然加深。在與王世杰的會談中，兩人討論蔣介石近日派人拜訪麥克阿瑟的決定，皆認爲此舉過於輕率。兩人認爲東京盟軍總部和華盛頓美方的關係非常微妙，故麥克阿瑟極可能婉拒會見蔣介石特使，此舉反過來將使中華民國政府難堪。爲此，王世杰請何世禮向蔣介石婉言建議打消此念頭。[69]

四、中共參戰

麥克阿瑟始終相信中共不會介入韓戰，如 10 月 3 日盟國對日委員會英國代表記載，麥克阿瑟認爲周恩來對印度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傳達美軍跨越 38 度線將面臨中共軍隊抵抗之說爲「虛張聲勢」。[70]然而，麥克阿瑟的評估並不準確，10 月 19 日，由彭德懷率領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25 日發起第一次大規模攻勢。中共的參戰不僅打亂了麥克阿瑟的計畫，也迫使美方重新考慮中華民國軍隊參戰的可行性。麥克阿瑟同樣無法確定中共參戰的動機和介入程度，如美國學者麥克沙勒（Michael Schaller）所言，麥克阿瑟「不知道北京是否要與美國打一場全面戰爭，或僅是爲了共產盟友進行象徵性、挽回顏面的有限干預」。[71]

中共參戰後，臺灣方面頓時成爲麥克阿瑟了解敵情的重要管道之一。11 月 4 日，何世禮收到盟軍總部電報，希望駐日代表團招募十幾位中文翻譯。[72]爲此，何世禮再度回臺。此時蔣介石和數名高級將領再度燃起麥克阿瑟需要中華民國軍隊的希望，如副參謀總長蕭毅肅和王世杰都建議何世禮晚幾天回東

68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0 月 18 日。
69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0 月 27 日。
70 Tokyo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3, 1950, FO 371/84099;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1.
71 Michael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p. 207.
72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4 日。

京，以免在蔣介石未作最終決定前，何世禮無法回應盟軍總部提出蔣介石出兵的要求。[73]9 日，蔣介石會見何世禮，其日記中寫道：「與何世禮談對麥帥態度，如其重新要求我派軍援韓，仍照前議不變，但必須美國解除其阻我反攻大陸之宣言，此乃自然之理乎。」[74]何世禮則記載：「談及派兵援韓問題，為維持我方信用，必須做到，冬服問題亦曾述及，最後擬再請求麥帥對次述二事予以協助：1. 希望解除攻擊大陸之協定。2. 現留越南之黃杰部數萬人，希望可令回國。」[75]兩者對比，可見蔣介石認為，中共參與韓戰後，國民黨派兵援韓不再是蔣介石的提議，而將成為麥克阿瑟的要求，而蔣介石藉此要求美方解除反攻大陸的限制，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對價交換關係。

如一位學者指出，「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不知道中國的計畫和目標，僅能依賴猜測和推測進行分析」。[76]美國中央情報局文件也透露，國民黨官員的意見對美方具有一定吸引力，因為美方無人真的知曉中共動機為何。美方最想知道的是，中共參戰究竟是北京還是莫斯科的意思，因為兩種情況會導致截然不同的劇本。在第一種情況下，中共或許只是展現「一個防禦的行為以保護東北的電力供應，且可能計劃控制一片狹窄的緩衝區」，但若是第二種情況，中共軍隊將採用「印度支那冷戰模式」且可能「包含將聯合國軍推回 38 度線的嘗試」。[77]在此局面下，何世禮作為最親近盟軍總部的中國人，其意見更受重視，如惠特尼將軍告知何世禮，「照目前情況，君可協助盟總之處甚多，如謁麥帥時不妨與其深談」。史崔特梅爾亦勸何世禮，「如謁麥帥時，應多將共軍情形告知」。[78]

73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8 日。
74 《蔣中正日記（1950）》，1950 年 11 月 10 日，頁 316。
75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9 日。
76 Stephen R. Taaffe, *MacArthur's Korean War Generals*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6), p. 103.
77 "Opinion of Nationalist Official on Chinese Communist Entry into Korean Conflict," November 6, 1950, General CIA Records, CIA-RDP82-00457R006200450009-9.
78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15 日。

對此刻正在籌劃反攻的麥克阿瑟而言，將聯合國軍推進至鴨綠江，必然面對中國東北的問題。在 11 月 14 日與麥克阿瑟的談話中，席波總結麥克阿瑟的首要目標是「摧毀鴨綠江的橋樑以便孤立聯合國軍防線和鴨綠江邊界的區域」，席波進一步記錄：

> 當然，聯合國軍會停在邊界。如果這項計畫可在接下來幾週河水結冰前完成，麥克阿瑟認為韓國戰役可畫下句點。若這項計畫失敗，且中共軍隊繼續從中國東北湧入北韓，從軍事角度而言，麥克阿瑟將不得不轟炸東北的關鍵地區。麥克阿瑟說如果必須執行這項計畫的話，局勢將陷入混亂，因為這必將導致蘇聯的介入。麥克阿瑟認為蘇聯介入只能擴大戰事，故他希望轟炸東北這項激烈行動不必付諸實施。[79]

11 月 16 日，麥克阿瑟與何世禮討論韓戰局勢。何世禮提出的首要問題，自然是「總統希望獲知目前有無需要我國協助之處，以及我國現在應進行之工作，敬請指示」，麥克阿瑟回答：「游擊隊問題極爲重要，杜魯門總統本年六月廿七日聲明內並未述及貴國在大陸上不能另闢途徑，其次即須從速訓練部隊，一俟武器到達，務須立即裝備。目前中共攻擊臺灣威脅雖已解除，但仍應高瞻遠矚，防其於半年或一年後舉行大規模之襲擊，隨時隨刻，均須照此目標，嚴行戒備。」麥克阿瑟的回答，顯然迴避蔣介石派兵援韓的提議，而是希望蔣介石以防守臺灣爲重。何世禮總結麥克阿瑟談話結論：「1. 聯軍在韓作戰必須進至中韓邊境爲止。2. 對共黨作戰已有準備，但觀測不致實現。3. 最近兩次晉見麥帥，對臺灣問題所發表之意見，似較渠訪臺前談論較形愼重。」[80]

顯然，根據麥克阿瑟的評估，聯合國軍與中共志願軍展開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不高，故不需蔣介石軍隊參戰，但麥克阿瑟仍對國民黨政權保持高度重視。11 月 19 日，何世禮與威洛比將軍「商妥由我方派員赴韓向俘虜查詢一

---

7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 (Sebald),” November 14,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 Korea*, pp. 1148-1149.

80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16 日;「何世禮紀錄會晤麥克阿瑟談話紀錄」（1950 年 11 月 16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14。

切」。[81]何世禮傾向將志願軍戰俘遣返臺灣，因爲根據他的估計，有一半的戰俘之前是國民黨的士兵。[82]根據美國中情局的文件，當時多數美國官員認爲中華民國軍隊「有經驗且熟悉中共戰術」。[83]同樣道理，盟軍總部也借重何世禮在國共內戰中的經歷，如惠特尼將軍與何世禮商討志願軍的心理，他認爲「中共不願與美軍作戰」、「深懼美機之轟炸」、「士氣低沉、武器不良」，何世禮則提醒，「過去中共之與我作戰，原亦非其所願，但最後仍不免於作戰，希望不可過於輕視中共」。[84]

11 月 25 日，中共發動第二次攻勢，再度瓦解麥克阿瑟結束戰爭的計畫，麥克阿瑟亦在 28 日承認「我們遇見一場全新的戰爭」。[85]何世禮在日記中記載：「昨日閱報，即已知美軍不甚順利，今晨閱報，證實美軍已漸次退卻，情勢益趨嚴重，果不出余之所料。匪軍以主力向南韓部隊攻擊，遂呈崩潰之勢。」[86]許多研究已指出，11 月底麥克阿瑟重新考慮使用蔣介石軍隊的計畫。[87]確切來說，中共發動第二次攻勢後，麥克阿瑟立刻建議參謀聯席會議使用蔣介石的軍隊，其兵力可即刻補充聯合國軍。麥克阿瑟強調，之前用來否決這項提議的理由——中共可能攻打臺灣或介入韓戰——已不復存在。[88]在回憶錄中，麥克阿瑟提及他要求被立刻授權直接和中華民國政府溝通派兵參與韓戰的計畫。[89]

81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19 日。

82 “Chinese Captives Held Nationalists,” *The Baltimore Sun*, November 23, 1950.

83 “Consequences of the Early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Forces in Korea,” December 27, 1950, General CIA Records, CIA-RDP79R01012A000300050005-7.

84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23 日。

8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Commander in Chief, Far East (MacArthu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November 28,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 Korea*, p. 1237.

8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28 日。

87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p. 212; Stephen R. Taaffe, *MacArthur’s Korean War Generals*, p. 117.

88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152.

89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Greenwich: Fawcett Publications, 1965), p. 375.

儘管如此，麥克阿瑟的建議仍然立刻遭到杜魯門否決，理由是該計畫將敵對行動擴展到臺灣和其他地區，也將擾亂美國和其他參戰國的同盟關係。[90]

略具諷刺的是，此時蔣介石似乎完全不知麥克阿瑟有使用中華民國軍隊的構想。眼見聯合國軍接連受挫，蔣介石在 12 月 1 日電告何世禮，要求其轉告麥克阿瑟，「韓戰挫折甚念，如需中國盡力之處，無不竭誠效勞，願共成敗也」。[91]麥克阿瑟隔日回電，「閣下好意，深為感謝」。[92]麥克阿瑟使用蔣介石軍隊的構想，並未因杜魯門的反對而終止。12 月 2 日，共和黨參議員要求杜魯門派遣蔣介石軍隊到韓國。[93]12 月 7 日，麥克阿瑟再次提及這項計畫，如史崔特梅爾寫道：「麥克阿瑟指出國軍在臺灣的雄厚兵力，並敦促允許他在聯合國的旗幟下將這些部隊投入韓戰。麥克阿瑟說蔣介石會提供 6 萬或 10 萬人——或所有軍隊——如果他需要的話。」[94]顯然，蔣介石 12 月 1 日對麥克阿瑟示好的訊息，似乎讓麥克阿瑟相信他可以對國民黨派兵數量予取予求。12 月 7 日，麥克阿瑟與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將軍會談，麥克阿瑟再度提及使用蔣介石軍隊一事。[95]麥克阿瑟甚至說道，如果對中國大陸發動海空攻勢的限制能被解除，加上如果他能使用 5 萬到 6 萬名國民黨士兵，他便能向前推進。如果中國人民志願軍停在 38 度線，便可接受根據該界限簽訂的停戰協議。[96]

---

90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p. 152-153.

91 「蔣中正電何世禮」（1950 年 12 月 1 日），〈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二）〉，《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427-054。

92 「何世禮電蔣中正」（1950 年 12 月 2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16。

93 James McGovern, *To the Yalu: From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Korea to MacArthur's Dismissal*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2), pp. 138-139.

94 William T. Y'Blood, ed., *The Three Wars of Lt. Gen. George E. Stratemeyer: His Korean War Diary*, p. 338.

95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166.

9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Minutes of the Sixth Meeting of President Truman and Prime Minister Attlee," December 8,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 Korea*, p. 1469.

在一場何世禮、董顯光和麥克阿瑟的會談中，兩位國民黨官員巧妙地向麥克阿瑟探詢重新考慮蔣介石提議的可能性。董顯光提問：「美國會不會利用其亞洲的盟友和蘇聯衛星國家作戰？」麥克阿瑟直接回答說，他贊成在韓國出動國軍，甚至向柯林斯將軍提出了這個想法。何世禮繼續問道，「為分散敵人兵力，中國國軍也許要在廣州登陸，尊意為何？」麥克阿瑟則建議把軍隊派往香港，這樣就不必在中國大陸沿海登陸，但英國人不會同意，因為他們「膽小如鼠」。意識到麥克阿瑟或許在開玩笑，何世禮認真詢問麥克阿瑟是否會在韓戰中使用中華民國軍隊。「決不會」，麥克阿瑟答道，「聯合國會反對，美國也不會贊成」。[97]何世禮在日記中評論麥克阿瑟：「由於此次中共參戰出其意料之外，故對共黨心理已較過去明瞭多矣。」[98]

聯合國部隊的撤退，嚴重損害了麥克阿瑟的威信。麥克阿瑟將中共志願軍的勝利歸咎於對美國對他的種種限制，認為這些限制阻礙他對志願軍進行「緊追」，包括越過鴨綠江和轟炸中國東北。[99]通過向何世禮和董顯光暗示，若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爆發戰爭，美國可能會提供支持，麥克阿瑟顯然傾向於升級戰爭規模，以挽回他的軍事主動權和聲譽。對此，華府則有完全不同的見解——由於韓戰前途未卜，美國政府認為「朝鮮不是打大仗的地方」。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麥克阿瑟保全他的部隊，因為聯合國部隊可能會從韓國撤出。在最壞的情況下，部隊應該撤回日本，因為它是美國在東亞戰略利益的主要焦點。[100]12 月 30 日，麥克阿瑟反駁，由於中共軍隊集中在朝鮮和中國東北，「該國其他地區很脆弱」，但「現有政策阻止了利用這一機會」。麥克阿瑟建議封鎖中國沿海，摧毀其工業戰爭能力，用蔣介石的軍隊壯大聯合國軍隊，並允許

97 「董顯光報告摘要」（1950 年 12 月 14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15。

98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2 月 14 日。

99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p. 238-239.

10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Far East (MacArthur)," December 29,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 Korea*, p. 1625.

中國國民黨對大陸採取「牽制行動」。[101]在收到華府的最終決定之前，麥克阿瑟又遭遇了另一次中共志願軍發起的攻勢。

五、開闢第二戰場的建議

1951 年初，中共志願軍發動第三波攻勢，迫使聯合國軍向南撤退。1 月 2 日，何世禮推測聯合國軍力不足，動用中華民國軍隊的機會即將到來。[102]兩天後，志願軍佔領漢城。但如同此前數次的情景，除非美方批准，否則任何關於中華民國軍隊參戰的計畫都是紙上談兵。因此，何世禮能做的只有等待，繼續經營他與美國人的關係。1 月 5 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再次拒絕了麥克阿瑟根據聯合戰略調查委員會進行的一項調查，以「國民黨對朝鮮的結果無法產生重大影響」爲由，否決了動用蔣介石軍隊的提議。[103]

1951 年 1 月，何應欽訪問東京，這一舉動引起毛澤東的警覺，他推測國民黨可能進攻廈門和汕頭，要求加強設防。[104]雖然這些攻擊沒有發生，但毛澤東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1 月下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眞考慮了支持蔣介石軍隊進攻中國大陸的計畫，以遏制中共在開闢其他戰線的能力。[105]2 月中旬，麥克阿瑟制定了一項計畫，提出「動用來自臺灣的 50 萬國軍（以及兩個海軍陸戰師），同時在朝鮮半島北緯 39 度線的東西兩側進行水陸兩棲和空降行動，以陸地連接，從而切斷並包圍中國人民志願軍」。[106]2 月 12 日，眾議員馬丁（Joseph Martin）強烈指責杜魯門政府阻止蔣介石在亞洲開闢第二戰

101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p. 181-182.

102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1 月 2 日。

103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184.

104 〈關於防禦國民黨軍隊進攻廈門、汕頭的電報〉（1951 年 1 月 13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冊 2，頁 24-25。

105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202.

106 Edgar O'Balance, *Korea: 1950-1953*, p. 94.

場。[107]幾天後，麥克阿瑟「轟炸中國東北基地，動用蔣介石軍隊」的提議再次被否決。[108]儘管如此，聯合國軍在戰場上迎來另一場大捷。3 月 6 日，聯合國軍發動撕裂者行動（Operation Ripper），15 日重新佔領漢城。21 日，麥克阿瑟會見何世禮，據中方談話紀錄：

何：你對韓國的局勢認為怎樣？

麥：他們已經遭受到了一個可怕的打擊，但並不是決定性的，他們也許再聚合起來，發動再一次的攻擊，但是根據情報方面得來的報告，林彪六個軍之中，有二個軍已奉命回安東整編去了，其餘四個軍或許會撤到北韓某地。倘若果真如此，我就看不出來他們怎會有足夠的軍隊來發動再一次大規模的攻擊，因為除了林彪的部隊之外，他們僅有第一野戰軍的三個軍團和第三野戰軍的三個軍團。在他們發動一個大規模的進攻之前，必需有更多的軍隊，所以以後幾天中，在我們收復春川以後，局勢或許會停頓的。

何：閣下聽見過第二野戰軍的三個軍團已經進入韓國，或者現在滿洲境內的消息嗎？

麥：我沒有聽說過。

何：閣下見過我們所獲得的那個情報嗎？據衡陽車站站長稱，他已奉命準備運送十九個師北上，我們相信為了補足十九個師，他們也許要把越南邊境的軍隊抽調一部分。

麥：我也沒有聽見過這件事。你再聽到這些部隊調動的消息時，請立即通知我。

何世禮又問：「轟炸中國的希望如何？」麥克阿瑟表示：「目前不會的，艾契遜〔艾奇遜〕一日留任國務卿時就不會，他是非常親英的，在目前的局勢中，

[107] James McGovern, *To the Yalu: From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Korea to MacArthur's Dismissal*, p. 164.

[108] I. F. Stone,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p. 264.

英國政府是最爲害的一個因素，在某方面說來，他們比俄國還要壞，因爲對於俄國，我們知道我們的立場。第一野戰軍的司令員與林彪比起來怎樣？」何世禮答以：「我認爲第二及第四野戰軍的司令員劉伯承和林彪，比第一及第三野戰軍的司令員彭德懷和陳毅要能幹些。」麥克阿瑟回覆：「請代我向蔣總統及蔣夫人致候。記住，你一聽到共軍部隊調動的消息，請立刻告訴我。」[109]

前一日，麥克阿瑟致信眾議員馬丁，該信於 4 月 5 日由馬丁公諸於世。[110]麥克阿瑟致馬丁的信，揭示了麥克阿瑟對華府施加於他的種種限制的不滿，他寫道：「你關於使用臺灣的中國軍隊的看法，既不違背邏輯，也不違反這一傳統。」[111]與此同時，正在日本訪問的兩位美國眾議員阿姆斯壯（O. K. Armstrong）和多恩（W. J. Bryan Dorn）強烈支持麥克阿瑟轟炸滿洲、並在戰爭中使用中華民國軍隊的計畫。[112]在一份聯合聲明中，兩位眾議員進一步聲稱「如果我們的部隊不能將行動帶到敵方領土，我們就看不到戰爭如何獲勝」，麥克阿瑟和他的戰地指揮官「不應該在他們認爲必要的軍事行動上受到限制」。[113]由此可知，儘管聯合國軍在 3 月分獲勝，但在麥克阿瑟及其支持者心裡，與其等待志願軍增援，不如佔據先機，將戰場越過 38 度線。然而，隨著麥克阿瑟的解職，使用蔣介石軍隊投入作戰的構想徹底終結。

六、駐日代表團在韓戰中的角色

儘管從未被派往韓國，但透過駐日代表團，蔣介石的軍隊仍然被賦予了幾個額外任務，爲聯合國在韓國的軍事行動做出貢獻。鑒於何世禮與中共打交道的經驗，何世禮開始擔任韓戰中採用的心理戰的顧問。中共志願軍加入戰場兩

109 「王世杰呈蔣中正翻譯何世禮將軍與麥克阿瑟將軍談話紀錄」（1951 年 3 月 21 日），〈美政要來訪（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17。按：檔案典藏描述誤植爲 1950 年。

110 Edgar O'Balance, *Korea: 1950-1953*, p. 101;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243.

111 J. Lawton Collins, *War in Peacetime*, p. 281.

112 William J. Sebald, *With MacArthur in Japan*, pp. 224-225.

113 "Truman Unswayed by M'Arthur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7, 1951.

個月後，艾倫（Roderick R. Allen）將軍祕密要求何世禮提交心理戰戰略的改進方案，並告誡何世禮勿讓實際上負責情報行動的威洛比將軍知情。[114]在他的改進方案中，何世禮將彩繪傳單作爲最重要的宣傳品。何世禮的意見可能讓麥克阿瑟更相信心理戰的可行性，1951 年 1 月 2 日，麥克阿瑟通知美國駐臺北領事，要求中華民國國防部提供 20 名翻譯人員（linguist）。[115]1 月 9 日，何世禮還請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尋找兩名有心理戰經驗的漫畫家，並提供總政治部製作的心理戰材料。[116]

2 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了第四階段攻勢，期間著名的「韓戰中的蓋茨堡戰役」（Gettysburg of the Korean War）發生在 2 月 13 日至 15 日，最終聯合國軍取得勝利。2 月間，麥克阿瑟發了兩封電報給美國駐臺北領事，要求從臺北增加 55 名翻譯人員（linguist），並派遣一名軍官前往臺北協調心理戰計畫。[117]2 月 17 日，何世禮電告蔣經國，心戰處處長可能會隨他訪臺，並希望會見蔣經國。[118]蔣經國於 2 月 19 日回覆何世禮，表示請求已獲准。[119]同日，何世禮告知蔣經國，陪同他的兩名工作人員是格林（J. W. Greene）和安布羅斯（Joseph Ambrose），並要求臺北當局盡快批准他們的入境許可。[120]蔣

114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2 月 29 日。

115 “CINCFE to US Consul, Taipei,” January 2, 1951, MacArthur Papers, RG 9, China, January-February 1951, Box 13, MacArthur Memorial Library, Norfolk VA, 引自 Callum A. MacDonald, “‘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The US, Britain and the POW Issue in the Korean War,” in James Cotton and Ian Neary, eds.,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8.

116 「何世禮電蔣經國」（1951 年 1 月 9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62-082。

117 “CINCFE to US Consul,” February 3, 1951; “CINCFE to US Consul,” February 18, 1951, 引自 Callum A. MacDonald, “‘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The US, Britain and the POW Issue in the Korean War,” in James Cotton and Ian Neary, eds.,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p. 138.

118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2 月 17 日。

119 「蔣經國電何世禮」（1951 年 2 月 19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三）〉，《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41-052。

120 「蔣經國電何世禮」（1951 年 2 月 19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六）〉，《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63-009。

經國可能在臺北會見了心戰處的代表，但會議的細節仍然保密。3 月 22 日，蔣經國致電何世禮，安排部分國民黨工作人員赴日、赴韓進行心理戰的手續。[121]

蔣經國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挑選了有能力執行這項任務的人選，5 月 21 日，蔣經國列出了準備前往日本的四名人員的姓名和護照號碼，並要求何世禮爲他們從盟軍總部取得簽證。[122]這四位人員分別爲梁鼎銘、孔秋泉、楊隆生和楚崧秋，其中梁鼎銘和楊隆生是畫家，任務是提供給志願軍的宣傳海報。[123]孔秋泉和楚崧秋後來分別成爲盟軍總部的顧問和聯合國司令部的通訊員。[124]6 月 26 日，蔣經國告訴何世禮，期待一兩個月後在臺北接見格林，商討更多心理戰細節。[125]衡量心理戰的具體成效實屬不易，正如一份報告指出，「除了大砲、轟炸和掃射或任何其他武器外，沒有任何積極的方式來判斷宣傳對敵軍或平民的影響」。儘管如此，心理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產生了積極的結果，現在再次證明在朝鮮衝突中是有用的」。[126]然而，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韓戰中的心理戰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中華民國的作用卻鮮有提及。[127]

1951 年 3 月 16 日美國總統駐韓特使（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ident in Korea）洛（Frank Lowe）將軍寫信給杜魯門總統，提到：

---

121 「蔣經國電何世禮」（1951 年 3 月 22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三）〉，《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41-059。

122 「蔣經國電何世禮」（1951 年 5 月 21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三）〉，《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41-075。

123 關於聯合國軍的心理戰漫畫，見 *United States Army, 8th, Korea, Psychological Warfare Propaganda Leaflets and Documentation Sheets, circa 1951*, Preserved in East 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著名反共畫家梁中銘爲梁鼎銘之弟，關於梁中銘反共漫畫作品的探討，見洪瑞鴻，〈美術救國：梁中銘反共漫畫研究（1949-196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124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125 「蔣經國電何世禮」（1951 年 6 月 26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三）〉，《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41-093。

126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1 (Spring 1951), p. 75.

127 Stephen E. Pease, *Psy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1950-1953*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1992); John Martin Campbell, *Slinging the Bull in Korea: An Adventure i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0).

> 麥克阿瑟將軍與惠特尼將軍建議我應該造訪遠東地區其他有專用運輸機服務的地點，尤其是香港、西貢、菲律賓、關島與沖繩。我稍後將能安排這些行程。然而，目前我希望儘快訪問臺灣，原因如下：我收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報告，內容提及對國軍在臺灣進行的一種極為獨特的戰鬥訓練，可以說，這種訓練至少是非常特別的。如果能成行的話，我希望能低調，或在非正式且保密的情況下進行訪問，並盡可能避免媒體報導。此外，我不希望，也不打算會見蔣委員長。這次任務我計劃與駐日中華代表團團長兼日本盟軍委員會中方代表、同時擔任駐日大使的何世禮將軍同行。他是我的好友，對我非常友善。如果我沒記錯，他應是西點軍校或其他美國軍事學校的畢業生，或者兩者皆是。如果何將軍當下無法同行，他將指派其幕僚陪同。我們會低調前往，避免接觸臺北的官方機構，直接前往位於島南的訓練地點，該地與臺北相距甚遠。當然，在未經上級（The Boss）知情與批准的情況下，我不會執行這項任務。[128]

1951 年 5 月 24 日，何世禮會見參與韓戰的第八軍團司令官李奇微（Matthew Ridgway），李奇微將何世禮介紹給負責情報工作的 G-2 部門助理參謀長恩尼斯（Riley F. Ennis）。[129]5 月 25 日，恩尼斯花了一個小時向何世禮詢問中共的情況。[130]盟總還要求駐日代表團派遣官員前往韓國調查戰俘。[131]何世禮指示胡維達和鄧華高訪問韓國，要他們向其報告情況。[132]盟總也找胡光麃到東京設計空投箱，以供戰場使用。[133]在停戰談判中，何世禮的意見也受盟總高級將領參酌。1951 年 7 月 19 日，恩尼斯將軍建議何世禮就與志願軍的談判方式提出意

128 “General Frank Lowe to President Truman,” March 16, 1951,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圖書館藏，President Harry S. Truman’s Office Files, 1945-1953 [microform], Part 4, Reel 2.
129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5 月 24 日。
130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5 月 25 日。
131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1 月 30 日、2 月 1 日、2 月 14 日。
132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3 月 28 日。
133 胡光麃，《波逐六十年》（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頁 363-367。

見。[134]兩天後，何世禮拜訪恩尼斯，恩尼斯在會上介紹了幾位 G-2 部門成員，他們渴望聽取何世禮的意見。[135]1951 年 10 月 30 日，何世禮要求蔣經國提供志願軍談判代表邊章五的背景。[136]蔣經國在兩天後的一封電報中，即向何世禮提供相關資料。[137]隨著戰事進入僵局，1952 年何世禮即鮮少參與和盟總的戰情討論。

七、李奇微取代麥克阿瑟

韓戰爆發後數月，麥克阿瑟與杜魯門的分歧日益擴大，最終導致前者被解職。以往的研究一致認為，麥克阿瑟的臺灣之行和對蔣介石的支持，是其垮臺的主要原因。在麥克阿瑟看來，其訪臺是為了考察臺灣是否具有自衛能力，這是作為聯合國軍司令的職責之一。然而，從國務院的立場出發，這是嚴重的越權舉動，因為美國官員對臺灣的訪問必定被視為外交問題。[138]還有一些觀點，認為麥克阿瑟被免職的導火線，來自 1951 年 3 月 24 日發表的聲明，其中明確向中共領導人發出以下警告：

> 因此，敵人現在必然清楚地意識到，如果聯合國改變現有的克制策略，不再將戰爭限制在韓國境內，而是擴大軍事行動至其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將使紅色中國面臨迅速軍事崩潰的風險。[139]

杜魯門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了他在收到這份聲明時如何深感被冒犯，他認為這是「聯合國軍事指揮官自行決定發表的極其不尋常的聲明」。杜魯門進一步指出：

---

134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7 月 19 日。
135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7 月 21 日。
136 「何世禮電蔣經國」（1951 年 10 月 30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七）〉，《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64-037。
137 「蔣經國電何世禮」（1951 年 11 月 1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四）〉，《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42-025。
138 Hiroshi Masuda, *MacArthur in Asia: The General and His Staff in the Philippines, Japan and Kore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70-271.
139 "Text of MacArthur's Korea Stat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51.

> 完全無視所有關於不得對外交政策發表聲明的指示。這是對我作為總統和總司令命令的公然違抗，也是對憲法賦予總統權威的挑戰，同時也藐視了聯合國的政策。麥克阿瑟的這一舉動讓我別無選擇——我再也無法容忍他的不服從。[140]

在日記中，何世禮對這番言論沒有透露任何內容，但他確實在東京感受到麥克阿瑟將被解職的氛圍。在 4 月 8 日與一位美國人的談話中，他們就麥克阿瑟被解職可能帶來的後果交換意見。[141]4 月 9 日，何世禮參加由艾倫將軍籌辦的雞尾酒會，美國陸軍部長佩斯（Frank Pace）在座。何世禮在日記中寫道，佩斯「年僅三十八歲，酬對之際儀態尚佳」。[142]在杜魯門的授權下，佩斯準備親自傳達總統關於麥克阿瑟被免職的消息。第二天，何世禮詢問澳洲駐日代表團團長霍奇森（William Roy Hodgson）對麥克阿瑟可能離職的看法，「渠避免正面答覆，但云渠感覺麥帥或將受責耳」。[143]

何世禮在 4 月 11 日日記中寫下他聽到麥克阿瑟被正式免職後的感想：「下午將赴吉田首相茶會，之前即聞麥帥解職之訊，故到達後見與會者莫不憂形於色。余覺全體主客中，大約以吉田首相最感不愉，蓋自由黨在朝一切措施，數年來完全由於盟總予以支持，始有今日。麥帥卸任之後，影響甚鉅也。又麥帥更迭之訊，美軍中級人員初尚未有知之者，迄三時廣播發表後，始各瞭然。」[144]4 月 16 日，麥克阿瑟離開日本時，何世禮出席了告別儀式，日記中寫道：

> （1） 故第八軍長 Walker 靈柩由日運美時，機場送別場面尚不逮今日之悲慘。

140 Harry S. Truman,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Vol. 2, p. 501.

141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4 月 8 日。

142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4 月 9 日。

143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4 月 10 日。

144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4 月 11 日。

（2）　麥帥將登座機時，有海軍士兵數十人大聲高呼 Good-Bye! General! We Are For You! 即此極簡單之語，驟使全場更覺淒愴。

（3）　余頗注視 Ridgway，覺其對於麥帥極為尊重，立於送行行列之首，完全按照部屬地位送別麥帥。

（4）　此間送別儀式中，鳴禮炮凡 19 響，舊金山駐軍亦擬鳴砲 19 響以迎麥帥，而國防部竟下令舊金山駐軍僅准鳴砲 17 響。[145]

麥克阿瑟離開後，爭取李奇微的繼續支持，成爲蔣介石的重要任務之一。1951 年初，蔣介石派何應欽訪問日本和韓國。威洛比在得知何應欽即將會見韓國總統的消息時勃然大怒，要求何應欽取消此行。[146]據何世禮日記記載：「午聞 Ridgway 之副官云，Ridgway 約見何敬公談話，何曾向 Ridgway 表示現在臺灣軍隊主官非渠舊部即渠學生，只須聯合國有命令，臺灣部隊願即開往韓國受 Ridgway 之指揮。余覺 Ridgway 自所樂聞，惟恐臺灣方面未必能同樣高興耳。」[147] 4 月 30 日，何應欽和李奇微會談 20 分鐘，他告訴李奇微中華民國軍隊士氣高漲，準備與共同的敵人作戰。[148]

蔣介石指望何世禮與李奇微繼續保持友好關係，1951 年 6 月 19 日蔣介石與何世禮會面時，問何世禮有沒有其他辦法接近李奇微，何世禮回答說李奇微將軍固執，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獲得他的「同情」，如果貿然靠近李奇微，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149]7 月以後，韓戰陷入僵局，何世禮想要遊說李奇微考慮蔣介石派兵的計畫，更顯得不切實際。然而，蔣介石仍未放棄，他將目標轉

---

145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4 月 16 日。沃克（Walton H. Walker）原爲美國第八軍團司令，死於 1950 年 12 月 23 日在南韓的一場吉普車車禍，遺缺後由李奇微接任。見 Stephen R. Taaffe, *MacArthur's Korean War Generals*, pp. 121-122;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Part One, p. 175. 席波在回憶錄中亦提及送別麥帥的十九聲禮炮，見 William J. Sebald, With MacArthur in Japan, p. 235.

146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3 月 21 日。

147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4 月 30 日。

148 「何應欽呈蔣中正報告與美國李奇威晤談軍援並配合韓戰」（1951 年 4 月 30 日），〈中央報告（二）〉，《蔣檔》，典藏號 002-080101-00029-017。

149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6 月 19 日。

移到 1952 年 5 月 12 日接替李奇微出任聯合國軍司令的克拉克(Mark W. Clark)身上。克拉克在回憶錄中回憶其訪臺時蔣介石的提議如下：

> 我們的討論最終引出了蔣介石軍隊的使用問題。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很久以前就建議將兩個國民黨師派往朝鮮。該建議未被接受。在臺灣期間的會談中，蔣介石主動提出，如果我國政府向他提出請求，他可以向朝鮮派遣最多三個他最好的師作為聯合國軍司令部的一部分。我將他的提議通知了華盛頓方面，但並未收到相關請求。局勢已經每天都在朝著停戰的方向發展，而停火是當前的目標。但我們的政府做出這樣一個挑釁性的舉動，無疑與停火目標矛盾。[150]

根據國民黨官方的記載，這場會面發生在 1953 年 3 月 25 日。克拉克聽到這項提議後，一如麥克阿瑟和李奇微的反應，告訴蔣介石這項提議必須由兩國政府決定，並表示若這項提議成爲事實，絕對會讓敵人感到震驚。此外，克拉克建議派往韓國的軍隊應該輪換，藉此獲得戰鬥經驗，了解中共的潛在威脅。[151]然而，如同蔣介石自韓戰開始以來所設想的所有可能的軍事計畫一樣，這項提議最終未能付諸實施。

八、鞏固留日華僑

韓戰爆發後，作爲與盟總的溝通管道，駐日代表團可謂中華民國在亞洲最重要的外交使團。除了關心韓戰局勢，駐日代表團在日本亦與中共展開無形鬥爭，最典型的案例，即爲盟國對日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問題。1950 年 6 月 1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致信席波，稱「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殘餘集團的所謂『代表』現已完全沒有參加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的資格，必須將他們從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的各項機構和會議中驅逐出去」；中共中央選擇黃埔軍校畢

150 Mark W. Clark, *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 (New York: Harper, 1954), p. 323.
151 〈談話紀錄〉（1953 年 3 月 25 日），〈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軍事將領談話紀錄（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5-010205-00108-004。

業的周士第取代何世禮。[152]隨後，蘇聯代表公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153]蘇聯在盟國對日委員會的代理成員波利亞申科（S. Polyashenko）致信席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 1950 年 6 月 19 日的電報，我謹聲明，我作爲蘇聯盟國對日委員會代理成員，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和我本人的要求，將國民黨代表排除在盟國對日委員會之外，並承認任命的周士第將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作爲中國在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唯一法定代表。」[154]25 日韓戰爆發，28 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討論韓戰局勢與杜魯門的聲明，會上正式任命周士第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團長」。[155]韓戰爆發後，盟總幾乎不可能接受周士第，中共中央對此顯然心知肚明，但透過宣布周士第的任命，中共中央再次宣示態度，如毛澤東在該會上講話指出：「美國對朝鮮、菲律賓、越南等國內政的干涉，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全中國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都將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決不會站在美帝國主義方面」。[156]

周士第的任命，讓日本的左傾華僑大爲振奮。1950 年 7 月 1 日，立場左傾的華僑團體「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致電周恩來：「敬悉我政府已任命周士第將軍爲駐日代表團長，旅日僑胞不勝忭欣，唯望周將軍早日東渡，肩荷巨任爲禱。」2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辦公廳將該電「原函轉致」周士第，但並未促其前往日本。[157]顯然，周士第此刻並無前往日本上任之可能，然而日本左傾華僑的騷動，已引起臺灣方面的警覺。9 月初，中華民國外交部致電駐

152 〈我周外長電盟國對日管委會．要求驅逐蔣匪幫「代表」通知我已任命周士第爲中國代表團團長〉，《人民日報》，1950 年 6 月 20 日，第 4 版；張篷舟，《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冊 4，頁 294；楊弘，《周士第將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頁 389。

153 Max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32.

154 "Russian Demands Nationalists in Allied Council be Ousted," *Nippon Times*, June 27, 1950, p. 1.

155 該任命狀由周士第家人提供，原件現存於海南省檔案館，另有一複製件，現存於海南省瓊海市周士第將軍紀念館。作者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承周士第之子周堅、周強、周勇提供該任命狀照片，特此致謝。

156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的講話〉（1950 年 6 月 28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冊 1，頁 423。

157 此兩份文件電子版由周士第家人提供，原件均存於海南省檔案館。

日代表團，指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機關報《華僑民報》7 月 24 日刊出該會 6 月 18 日致電周恩來「表示歡迎中共派赴日本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之僞代表周士第」，並組織「新中國代表團參加對日理事會促進會」，向日本各地華僑「展開簽名贊助運動」，並向盟國對日委員會其他三名代表提出請求。電報指出該會「公開反對政府，支持共僞，態度明顯」，除此之外：

> 又該報七月十七日及八月七日第（35）及第（38）各號均以全幅登載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及劉少奇等逆之報告，並轉載偽北平人民日報社論。該報七月卅一日社論，抨擊吉田首相，指為以「中國及朝鮮」為敵等語，所稱「中國及朝鮮」自係指「中共偽政權及北韓」而言。再其所引電訊，悉採新華社發電，則其公開為共偽宣傳，已屬毫無疑問。其所發謬論，必將愚惑僑民，為害殊大。查該報似未經日本政府合法登記許可發行，現盟總及日本政府正在積極整肅共黨活動，希即（一）洽請禁止該「華僑民報」繼續刊行；（二）嚴密監視該「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動向，並希隨時具報為要。[158]

駐日代表團與盟軍總部洽商後，《華僑民報》隨即遭到停刊，其背後最大原因，顯然與韓戰爆發後該報大力爲中共宣傳的立場有關。10 月 12 日，《人民日報》有如下報導：

> 在國際帝國主義扶日政策的鼓動下，日本反動政府最近日益猖獗。迫害進步分子，剝奪言論自由。不到半年，所有日本出版的民主報刊，被禁殆盡。最後又對華僑所出版的《華僑民報》伸出魔手。蔣介石匪幫的偽「駐日代表團」更視《華僑民報》為眼中釘，在偽代表團長何世禮就任之初，就對《華僑民報》特別注意，並作出種種恐嚇。因為

158 「外交部致駐日代表團」（1950 年 9 月 2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下稱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35。據一留日僑民報告，「中共外團在日有民主促進會，由臺籍青年許柳村主持。與留日學生會合辦華僑民報，定期舉行時事座談會講演會，並推銷香港大公、文匯等書報，完全爲中共操縱。」見〈行政院秘書處通知教育部抄留日僑民及留學生情形〉（1950 年 5 月 23 日），收入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 留學日本事務（二）》（新店：國史館，2001），頁 525。

> 恐嚇無效，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日本政府狼狽為奸，假借「盟軍總部」的招牌，對僑胞施行高壓手段。……由此更證實了偽「駐日代表團」與國際帝國主義及日本政府的共同陰謀，愈益增加華僑的憤恨。華僑對偽「代表團」這種出賣同胞的行為，與國際帝國主義及日本政府的法西斯手段，莫不切齒，堅決發誓，一定要鬥爭到底。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除了盡力進行鬥爭外，並將迫害情形報告給祖國政府和全國同胞，呼籲大家聲援在日被壓迫的同胞。[159]

在駐日代表團的報告中，亦寫道「已密洽有關方面於九月廿八日將該華僑民報查封」。原電文中的「盟總」兩字遭塗銷，改以「有關方面」四字取代，該句末又以括號註明「循代表團之請，經過情形勿予披露」。[160]在周士第的任命案上，儘管自 1950 年 6 月中共發布該項人事安排後，聯合國軍在韓戰中佔得上風，且麥克阿瑟與臺灣關係日趨密切，但國民黨高層仍擔心周士第啓程前往東京。9 月 29 日，蔣經國通知何世禮，周士第已啓程前往日本，並要求何世禮關注此事。三天後，何世禮回報稱周士第抵日的消息並不準確，但中共人馬似乎活躍於日本，故何世禮曾派人祕密調查。[161]11 月 8 日，蘇聯代表基斯連科（Andrei P. Kislenko）在一次盟國對日委員會會議上再次提出中國代表的問題，但其意見遭到駁斥。[162]至此，何世禮在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席次再無面對挑戰。

儘管盟國對日委員會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不了了之，但該事件反映中共急欲削弱國民黨在日本的勢力。對中華民國而言，儘管美國政府和盟總無意支持中共，但留日左傾華僑勢力的日益擴大，對駐日代表團而言有如芒刺在背。事實上，戰後初期駐日代表團試圖大力整頓日本僑務，在其「取大同團結破除界限之指導方針」下，各地華僑組織華僑聯合會，於 1946 年 4 月正式成立「中

---

159 〈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控訴反動派封閉《華僑民報》．呼籲祖國政府聲援被迫害的旅日華僑〉，《人民日報》，1950 年 10 月 12 日，第 4 版。

160 「外交部報告」（1950 年 10 月 29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39。

161 「何世禮電王世杰、蔣經國」（1950 年 10 月 2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五）〉，《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62-055。

162 Max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p. 133.

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163]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在日臺僑對國民黨的認同開始動搖，其中一些人開始浮現「臺灣獨立」傾向。關於此事，中共官方史學一直錯誤地認爲，二二八事件導致日本華僑的政治認同轉移到了中共。[164]誠然，部分在日華僑對中共的好感，從 1947 年起已緩慢上升，但現有史料顯示，直到 1949 年 10 月，明確支持中共的在日華僑人數才大幅增加。日本華僑組織，也開始分裂爲「大陸系」和「臺灣系」。[165]中共在國共內戰中的勝利，贏得了許多在日華僑的支持，甚至轉向認同中共政權，如駐日代表團的一份報告指出，一些左傾華僑計劃在 10 月 10 日當天，發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公告，但被代表團成功制止。[166]儘管如此，仍有立場偏左的「留日華僑總會」、「華僑民主促進會」等團體帶頭在 10 月 10 日舉行慶祝活動，據《大公報》報導，「於是僞官大驚失措，『沈副團長』這個傢伙，遂招待記者，發表了一個流氓式的警告謂：你們若公開支持人民政府，那我將要不負責保護你們了……」。[167]

部分留日學生藉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表達對駐日代表團四年來遲遲不發放補助金之不滿，最終迫使代表團從 1949 年 11 月起發放補助金，惟執行起來缺乏原則。直到何世禮 1950 年 6 月上任後，始訂立制度，藉此鞏固留日學生政治思想，如何義麟文中指出：「代表團由何世禮將軍接任團長，他開始採取嚴格審查辦法，凡思想稍有問題或成績欠佳者，均隨時停止補助，最後人數降到一百多名。藉著補助金發放的審查，他也另組一個在國府控制下的新

163 宋越倫編著，《日本華僑概況》（臺北：正中書局，1987），頁 72；羅晃潮，《日本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頁 374；陳鵬仁，《日本華僑概論》（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頁 68；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日本華僑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5），頁 200-201。旅日華僑楊國光在回憶錄寫道，戰後有兩個分別代表臺灣和中國大陸的社團，1946 年 5 月合併爲東京華僑聯合會，見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 145-148。

164 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頁 175。

165 羅晃潮，《日本華僑史》，頁 374-375。

166 「駐日代表團致外交部」（1949 年 10 月 12 日），〈有關日本政情資料〉，《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簡稱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02-02-01-070。

167 〈我國留日僑胞學生．熱烈擁護人民政府〉，《大公報》（香港），1949 年 12 月 26 日，第 7 版。按，「沈副團長」指駐日代表團副團長沈覲鼎；「你們」指華僑；「我」指國民黨。

留日同學會，排除所有親共學生。」[168]何世禮赴任前，教育部致電外交部，「邇來據悉留日學生思想大半左傾，甚至公開侮辱政府，駐日代表團未有適當處置。茲値該團新任何團長赴任之際，除函請行政院祕書處轉陳何團長，凡思想左傾附匪有據者，及在日期間已久修畢學業者，均應停止補助」。[169]在日記中，何世禮多次記載相關細節，如 6 月 15 日接見三名留日中國學生會代表：「上午十時接見我國留日學生會主席王兆元、副主席洪山海、執行委員喬傳源，經明白宣示本團今後管理留學生方針，如切實求學服從國民政府者，本團即予協助，如超出學生求學範圍即不能。謂余言之不預，並告以津貼再維持一個月，自七月分起，如再公開詆毀國民政府者，即予停發，將此項剩餘之款，改予補助其他貧苦學生。王兆元等三人均認爲無意見，談話情緒亦佳。」[170]6 月 19 日，日記記載：「各區華僑因在東京開會，來團相談，大致情形尚佳。余明白宣示不可左傾，渠等請求商人希望謀利、學生希望讀書，當告以在此原則之下，本團百分之百予以支持，談話經過良好。」[171]

一週後韓戰爆發，又給留日左傾華僑注入一劑強心針，臺灣方面對此深表擔憂。1950 年 7 月 28 日，總統府祕書長王世杰致電外交部部長葉公超：

> 據稱自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兩次演說後，對我所表態度頗易使一般臺胞發生疑慮，誠恐有少數不肖之徒提出主張。其最可慮者，厥為日本方面。查臺胞僑日者，計三萬餘人，其在東京者，約一萬餘人，餘則

168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2，頁 184。
169 〈教育部電外交部爲留日學生補助金事電復查照〉（1950 年 6 月 2 日），收入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 留學日本事務（二）》，頁 2-3。
170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6 月 16 日。在駐日代表團 1949 年 11 月製作的留日學生補助金清冊中，王兆元的品行思想爲不詳，然而到了 1950 年的留日學生思想言行調查表中，王兆元的調查內容爲思想不正確，見〈留日學生思想言行調查表〉（1950 年 8 月 28 日）、〈留日學生補助金清冊〉（1950 年 4 月 18 日），收入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 留學日本事務（一）》（新店：國史館，2001），頁 47、315。1951 年王兆元向中共領取〈回國歡迎信〉返回中國大陸，洪山海於 1953 年 1 月抵達北京，參見〈外交部電駐日代表團副本抄送教育部關於日警搜查東京中華學友會事請查照〉（1951 年 12 月 12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電送教育部有關我國留日學生集體前赴大陸情報一件〉（1953 年 2 月 24 日），收入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 留學日本事務（二）》，頁 536、574-575。
171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6 月 19 日。

> 散居大阪、神戶及橫濱等地。內中以林以文為同鄉會會長，年青而有聲望；次則李延禧，為一年高商人，不諳政治；再次劉明電，為研究馬克斯主義之學者。此外由臺灣前往者，有林獻堂及謝南光二人，聞共匪對上列諸人竭力拉攏，除劉明電已被匪利用外，其餘諸人，日久恐將動搖，日後倘受共匪矇騙，發生違反祖國之言論或行動，則臺灣將來之地位恐受影響。擬請政府密切注意，俾克事先防止等情，並奉諭應轉知何團長注意等。[172]

8 月 15 日，何世禮致電葉公超：「此間華僑人數眾多、情形複雜，過去與本團絕少往還，自弟接任以後，經予多方勸導，始與本團漸形接近，不僅隨時來團洽商僑務，且已有公開表示擁護政府者。又過去華僑學校早已不懸掛國旗，亦經予以糾正，惟改變多數人之心理、挽回多年來惰性，決非朝夕可能之事，將來遇有進展，定當隨時奉報耳。」[173]同日，駐日代表團覆電葉公超：「（一）林以文態度已大改變，且公開表示擁護政府；（二）林獻堂正在轉變中；（三）謝南光暫時無大行動，已予密切注意；（四）李延禧、劉明電二人，俟查明另報。」[174]

何世禮亦投入大量心力參與華僑組織活動，以遏制左傾思想擴大，如 8 月 21 日《中央日報》報導：

> 橫濱華僑團體中近有共黨分子大規模滲入，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何世禮將軍曾親往視察，指示華僑團體清除共黨分子。兩天前何將軍抵達橫濱後，整個華僑區都懸掛國旗。被共黨分子佔據的當地國民黨支部辦事處中，有三分之二已沒有共黨分子的蹤跡，顛覆性的傳單小冊子也忽然不見。愛國的華僑們已因何團長的親臨而大為振奮，他們深信

---

172 「王世杰電葉公超」（1950 年 7 月 28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26。

173 「何世禮電葉公超」（1950 年 8 月 15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30。

174 「駐日代表團電葉公超」（1950 年 8 月 15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館藏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28。

> 將可獲得中國駐日代表團的全面支持，以消滅橫濱華僑團體中的共黨勢力，並阻止共黨分子滲入其中。[175]

然而，如何世禮所言，鞏固華僑支持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國際局勢影響下，華僑左傾浪潮方興未艾，華僑懸掛五星旗、毛澤東和史達林畫像之事時常發生。如 1950 年 10 月 7 日在華僑學生會舉辦的一場體育賽事上，在場人士公開唱起中共歌曲。何世禮爲此大爲不滿，向林以文詢問此事情況，林以文回答「非會場以內之事」。據何世禮當天日記，「在會場外有共黨數人設一小攤，以共黨宣傳相片供人閱看，林以文允即登報否認此事，雖情形並不十分嚴重，但決定仍按預定計畫準備，並令憲兵隊特加注意，以免共黨於晚間來團張貼標語」。[176]10 月 10 日的國慶儀式上，駐日代表團僑務組組長劉增華講述東京中國學生會前主席張玉峰如何「投降」北京，要求聽眾不要重蹈覆轍。何世禮在日記中寫道：「據聞過去此間之雙十節，華僑學生因受共黨蠱惑，公然於會場中高懸中共之五星旗，且約日共領袖講演、散發共黨傳單，迄今歲國慶始完全澄清。足見余就任以來四個月之努力，已開始收穫。今日之局即充分表現本團之成績，並非金錢所能購致，完全由於人之同情心與信仰心。」[177]

此時何世禮顯然過度樂觀，因部分留日學生儘管領取政府補助，仍表露出左傾思想。1951 年 2 月，何世禮擬定三個步驟以削弱留日華僑對中共的支持。首先，下令所有在日本的華僑和中國學生重新登記，以便清查政治認同不明的人士。其次，下令整頓海外華人社團，驅逐任何左傾分子，預計該任務將在三個月內完成。第三，何世禮在必要時與盟總商談將不良分子遣返臺灣。[178]在留日學生方面，何世禮從政府補助下手，迫使學生效忠國民黨。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報告指出，「駐日代表團每月動用五千美元資助在日中國學生的資金很快就

175 〈何世禮親臨橫濱．指導華僑團體．清除滲入共匪〉，《中央日報》，1950 年 8 月 21 日，第 1 版。
17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0 月 9 日。
177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0 月 10 日。
178 「中國駐日代表團致外交部」（1951 年 2 月 10 日），〈日本僑務〉，《外交部》，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02-18-01-005。

會耗盡。代表團已要求國民政府提供額外資金，以便該計畫能夠繼續作爲控制日本學生政治活動的一種手段」。[179]又據中情局報告，「代表團最近決定在海外學生中散布謠言，大意是在即將到來的學生組織幹部選舉中，只有投票給代表團批准的候選人的人才能獲得補貼。這些不合作的學生將暫停他們的補貼。」[180]5 月 4 日，何世禮日記寫道：「下午召集留日學生，告以渠等同情團方，團方亦同情渠等。但政府在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已有無力繼續補助之勢，本團雖必代爲力爭，但渠等亦應有所表示，望即聯名請求繼續補助，俾可據以轉請。」[181]所謂「有所表示」，顯然是政治上的表態。

九、林以文案

在華僑團體方面，何世禮介入整頓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爲支持林以文取代林炳松出任「日本華僑總會」主席。[182]何世禮在上任團長後，即密集約見時任「日本華僑總會」主席林炳松與「東京華僑總會」會長林以文，透過兩人辦理華僑事務。經過數個月觀察，何世禮日漸表露對林炳松的不滿，主要原因出自林炳松的政治立場。早在 1949 年，林炳松已被視爲中共的支持者，[183]故 1950 年 6 月何世禮上任團長後，「內外新聞社」社長蔡長庚[184]即向何世禮表達駐日代表團貸款「國際新聞社」兩萬美金的不滿，因「該社從來反共，而本團不甚

179 “Activities of Chinese Mission to Japan,” August 7, 1951, General CIA Records, CIA-RDP82-00457R007900010010-7.

180 “Activities of Chinese Mission to Japan,” August 7, 1951, General CIA Records, CIA-RDP82-00457R007900010010-7.

181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5 月 4 日。

182 關於「日本華僑總會」的正式名稱，多方說法不一。如《人民日報》稱其爲「留日華僑總會」。

183 〈中共が日本に支部・責任者は既に渡日活動〉，《讀賣新聞》，1949 年 6 月 4 日，朝刊，第 2 頁。

184 內外新聞社社長蔡長庚爲留日臺僑，其發行的《內外時報》（内外タイムス）於 1950 年 11 月獲准進口臺灣，可見其反共立場得到官方認可，見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45（2016 年 5 月），頁 215。相關研究見，島田大輔，〈占領期《中華日報》《内外タイムス》の研究一九四六—一九五三（下）：一九五〇年代における《内外タイムス》の台湾進出〉，《メディア史研究》，期 42（2017 年 10 月），頁 112-134。

予以協助，轉而協助首鼠兩端、二三其德之國際新聞社」。[185]8 月，何世禮約見林炳松，討論國際新聞社的改組問題，林炳松稱「社內所有共黨均經清除」，何世禮日記中記載「此人態度明確，露於行動，余已語渠本團必予極力支持」。[186]

9 月 30 日，林炳松以「留日華僑總會」會長身分出席立場親中共的「日中友好協會」成立大會，該新聞見於 10 月 18 日的《人民日報》。[187]此外，林炳松也出席 10 月 10 日華僑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活動。[188]這兩項消息必然傳到何世禮耳中，惟其仍對林炳松採取容忍觀察態度。10 月 28 日，「留日華僑總會」常務代表委員會致電毛澤東，「慶幸中國以嶄新的姿態，步向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途上，我們不禁要喊新中國萬歲！新中國前途無疆！……茲趁新中國成立的機會，敬祈早日樹立保僑、愛僑、護僑的僑務新猷，俾便僑民們安居樂業。」[189]該電文於 12 月底登載於香港《大公報》，值得注意的是，電文雖然表露出對「新中國」成立的欣喜，但並未貶斥中華民國與駐日代表團。正因如此，到 11 月初，何世禮仍認為林炳松是可以籠絡爭取的對象，據《中央日報》報導：

> 關於匪諜在留日華僑間的陰謀活動，據何團長說已經不像從前那麼猖獗，原因是代表團裡面的少數不良分子業已離職。何團長指出大多數華僑都竭誠擁護政府，痛恨中共匪黨在大陸上的黑暗統治。但過去因為沒有領導，以致少數陰謀分子敢於興風作浪。他指出現在的華商總會會長林炳松是一位愛國志士。[190]

---

185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7 月 28 日。
186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8 月 14 日。
187 〈日中友協正式成立．促進兩國文化交流與自主貿易〉，《人民日報》，1950 年 10 月 18 日，第 1 版。
188 〈我國留日僑胞學生．熱烈擁護人民政府〉，《大公報》（香港），1949 年 12 月 26 日，第 7 版。
189 〈留日華僑總會．致毛主席電〉，《大公報》（香港），1949 年 12 月 26 日，第 7 版。
190 〈旅居日本華僑．竭誠擁護政府．在日僑生亦安心學業．何世禮昨訪吳國楨〉，《中央日報》，1950 年 11 月 3 日，第 2 版。

儘管何世禮仍對林炳松抱有期待，或多或少仍對其「腳踏兩條船」的政治立場抱有疑慮。11 月底何世禮參訪大阪時，即親自視察國際新聞社，日記中寫道：「經向負責人林炳松等說明本團之立場，希望渠等加以注意，嗣後務須隨時檢點。一面向林炳松表示本團支持之意，一面促起全部工作人員之警覺，如再疏忽，本團即將採取行動。大致反應頗佳，遂囑胡秩五、宋越倫二君與渠等研究，務須從速改善。」[191]所謂「疏忽」何所指，何世禮並未在日記中提及，惟根據當時情勢判斷，顯然為該社的政治表態問題。12 月 14 日，駐日代表團回電外交部，稱代表團已密切注意「國際新聞社」之言論、「隨時加以糾正」，「並多方與林炳松保持聯繫，加以監督控制」。電文中又強調，「最近曾由本團督促林炳松，由渠負責保證，該報此後不再發生反動言論，並由本團介紹妥人，加入該報，對言論加以直接控制，目下正在物色人選之中」。[192]與此同時，林炳松被發現擔任立場親中共的「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駐日代表團僑務處因而「力勸林炳松辭退該會副會長」。[193]12 月 19 日，因留日學生團體開會時「另選會長，且在選舉時懸出毛澤東相片甚多」，何世禮「遂約林炳松來團當面警告，令其速即設法，如仍照常以款項津貼學生，而渠輩仍反對政府，本團即將對汝採取行動，林始唯唯而退」。[194]至此，何世禮對林炳松之好感急轉直下。此外，駐日代表團借貸「國際新聞社」兩萬美金一事，亦引起不小波瀾，何世禮在 1951 年 2 月致電總統府，解釋該貸款為前任團長朱世明所核定，期限為 1950 年 5 月 31 日至 1951 年 5 月 30 日，唯一條件為「該款貸出後，該報不得反國策反對政府之言論」，保證人起初為林以文，1950 年 9 月改為林炳松，且「已通知將該款收回」。[195]1951 年 6 月 2 日行政院研討改善日本僑務

191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1 月 27 日。

192 「駐日代表團電外交部」（1950 年 12 月 14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58。

193 「駐日代表團電外交部」（1950 年 12 月 16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館藏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56。

194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12 月 19 日。

195 「何世禮電周宏濤」（1951 年 2 月 13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一）〉，《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344-035。

審查會的審查結果表明：「原報告關於僑民組織一項內，所稱『國際新聞』，查該報時有對政府不利消息之刊載，因其編輯人員，有傾向共黨之嫌，應由代表團促令改組，不然前貸給之二萬美元，應即責令償還。」[196]

由於徹底對林炳松失去信任，何世禮在 1951 年 3 月日本華僑總會會議上要求總會改組，並要求林炳松交出會印，推出林以文、周祥賡、張明博三人為監察委員，負責「維持總會改組以前之業務」，何世禮在日記中稱林炳松去職為「本團數月來最大勝利之一事也」，可證其對林炳松之強烈不滿與失望。[197]《日本時報》同樣關注何世禮親自出席日本華僑總會會議一事，據報導：

> 國民政府向日本華僑總會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他說，臺灣在民主形式的地方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而大陸上成千上萬的人正在被中國紅軍屠殺。他強調在日本的中國居民與國民政府密切合作以建立世界和平的必要性。
>
> 何將軍說，蔣介石將軍非常關心在日中國居民，並已要求何將軍回日本參加集會。會議期間，所有與會人員一致通過了一項支持蔣將軍的決議。他們還決定盡一切可能為國民黨的空軍、陸軍和海軍部隊提供便利。目前，在日本的中國居民有 38,829 人。他們有五十個協會。[198]

林以文為著名華僑領袖，駐日代表團副團長沈覲鼎稱其為「著者自駐日代表團時期以來所矚目而扶助的僑領」。[199]惟中華民國遷臺後，林以文的政治立場仍引起政府疑慮。1950 年 7 月，外交部擔心「在日臺胞態度曖昧」、「可能被匪利用，發表反對祖國言論，影響臺灣將來之地位」，故要求駐日代表團查明四位在日臺灣人的政治態度，其中林以文名列第一，可見其在政府心中之

---

196 〈行政院令教育部接丘念台資政赴日工作報告陳述留日僑胞困難甚多抄發審查會紀錄等令仰遵照〉（1951 年 6 月 9 日），收入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 留學日本事務（一）》，頁 55。

197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3 月 20 日。

198 "Chinese Meet Here," March 20, 1951, *Nippon Times*, p. 1.

199 沈覲鼎，〈使日鴻爪（三）：對日往事追記之三九〉，《傳記文學》，卷 31 期 4（1977 年 10 月），頁 128。

重要性。[200]何世禮在 8 月 7 日收到外交部來電，15 日即在報告中指林以文「態度已大改變，且公開表示擁護政府」。[201]何世禮之答覆，究竟來自駐日代表團僑務組之判斷，抑或何世禮之個人觀察，現已無從判斷，但何世禮確曾在這一個禮拜內，出席林以文舉辦的晚宴，其日記中透露的個人觀察，頗足玩味：

> 晚赴林以文君之宴，酒過數巡，基隆參議會議長黃樹水君起立致詞，由華僑總會副會長于恩洋任翻譯。黃君詞中原多頌揚總統及擁護政府之語，而于君均未譯出，此人行動應特予注意。旋林以文君致詞，其擁護政府之誠與黃相同。余來東京兩月矣，初聞華僑中多反動分子，而今日第一次眾晤即有此成績，深感愉快。但非黃君之力無以致此，更非黃君之力，林以文亦不能有此表示。故於黃君回臺之時，余特電陳院長，謂派黃在此甚佳；另函總統及陳院長，希望黃君早日返此。良以臺灣派來之人，其宣慰之力均不逮黃也。[202]

何世禮日記中的個人觀察，體現了一位不諳日本政情、對僑務全然陌生的駐日代表團團長，如何敏銳地透過細節，觀察一個人的政治傾向。何世禮提及的于恩洋，爲國民黨著名將領于學忠之子，早在 1947 年已明顯表露左傾立場。[203]其擔任翻譯之舉，即爲左傾華僑在日本從事滲透工作之生動案例，在 1950 年 12 月駐日代表團致外交部的報告中，亦評估于恩洋「思想左傾」，但「尙不敢公開與政府搗亂」。[204]何世禮對林以文印象既佳，又對林炳松日漸不信任，故在後者去職後，何世禮即「內定」由林以文出任新會長。惟其強勢要求林炳松去職之舉，引起華僑總會部分委員不滿，據其 1951 年 3 月 28 日日記記載，「下午聞華僑總會一部分委員擬醞釀風潮，遂約林以文來談判，林偕一陳禮桂同

---

200 「葉公超電何世禮」（1950 年 8 月 7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27。

201 「駐日代表團電葉公超」（1950 年 8 月 15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28。

202 〈何世禮日記〉，1950 年 8 月 8 日。

203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2，頁 163。

204 「駐日代表團電外交部」（1950 年 12 月 14 日），〈台灣獨立運動（一）〉，《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58。

來，林之態度尚佳」。[205]隔日，「林以文來，謂總會將於四月十五日開一代表大會。余告以余之態度，只須不選出反對政府之人，對會章在文字上酌量修正，余並無成見，惟須林以文能控制代表大會，不發生其他問題，方可接受」。[206]

有了林炳松的前車之鑒，何世禮無論如何都要新當選之會長能心向政府，爲此何世禮廣泛接觸華僑，自云：「每日總須消耗數小時於接見僑領，向渠等宣導也。」[207]經歷漫長的改選準備後，林以文於 1951 年 9 月正式就職日本華僑總會會長。[208]然而，林炳松給何世禮帶來的困擾並未完全消除。年底，蔣經國再度就駐日代表團借貸《國際新聞社》兩萬美金一事詢問何世禮，並詢問林炳松於 1950 年往返臺灣是否受代表團之邀，何世禮除了再度解釋該款項係由朱世明核定，更表示林氏返臺發生在 1950 年 5 月，故「弟何能有所邀請？」何世禮最後指出「渠之解除僑總會長，因擁護政府之僑胞不予信任，況某方亦告知渠之財產係發勝利財而來，遂由本團於今年三月策動改選」。[209]或許是受了林炳松之累，在數十年後的回憶文章中，何世禮將成功「爭取」林以文一事，視爲日本僑務的重大突破：

> 當我於民國三十九年出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時，日本的華僑總會，已受共匪爪牙所把持，情勢至為險惡，幸得鄭兄對日本僑情，至為關切，同意我迅速敦請東京華僑會館會長林以文先生出而領導日本全國華僑總會，並立即進行競選會長的工作，其間經過一番激烈的奮鬥，並獲盟總予以支持和協助〔，〕結果，林氏卒獲勝利，從左傾分子勢力中奪回會長的職位，重握該總會的領導權。然而當我提出林氏競選之始，

205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3 月 28 日。
206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3 月 29 日。
207 〈何世禮日記〉，1951 年 5 月 2 日。
208 〈全日華僑協會主席．林以文昨就職．向僑團代表發表演說對歧視性和約提抗議〉，《中央日報》，1951 年 9 月 14 日，第 1 版；〈華僑連合会長就任披露〉，《讀賣新聞》，1951 年 9 月 8 日，朝刊，第 4 頁。
209 「何世禮電蔣經國」（1951 年 12 月 6 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七）〉，《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664-042。

> 即曾備受各方的責難，認為選人不當，迨後林氏獲選，出錢出力，領導有方，方始受到各方面之贊揚，鄭兄知人善任之功，至不可沒。[210]

文中所指的鄭兄，爲時任國民黨第三組主任的鄭彥棻。又據何世禮回憶：

> 又自林氏競選獲勝後，我復奉到指示，要求林氏組團回國參加國慶，經長時間的洽商後，林氏始允組成僑團回國，不意當班機起飛前數小時，林氏突到代表團部，告以國內情況不明，深懼回臺將立被逮捕，故不得不中止回國之行云云。我當時狼狽情形，可想而知，幸與鄭兄通電話中，獲其力為保證，並表示親至機場迎送林氏及其全體團員，而我對林氏亦懇切表示，倘渠不能離臺返日，我何某亦即回國奉陪，然後林氏始允勉強成行。誠以當年各地僑領與政府之間至為隔膜，而組團回國參加國慶，林氏實為第一人，則林氏當日之猶疑瞻顧，自是勢所使然。[211]

林以文之顧慮，顯然是擔心回到臺灣後，被當成左傾華僑受到調查而無法脫身。在何世禮保證下，林以文才回到臺灣，而其公開發言，亦在強調留日華僑均心向中華民國：「旅日僑胞素來是擁護政府擁護領袖的，並且切望反共抗俄的成功，拯救我們在大陸的同胞於水深火熱，同時，據前幾天報載，日本政府將與我中華民國，簽訂和約，我們聞之不勝興奮欣喜，因爲旅日僑胞，身處其境，尤其特具關心，我們衷心期待，對日合約，早日簽訂，我們在謁見各長官時，自當表達此意。」[212]林氏之發言，顯然刻意高估了留日華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人數，惟在當時《中日和約》即將簽訂的氛圍下，左傾華僑的抗議與不滿，並未引起臺北方面的重視。

---

210 何世禮，〈彥棻兄其人其事〉，收入陳伯中編，《鄭彥棻八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頁 7。
211 何世禮，〈彥棻兄其人其事〉，收入陳伯中編，《鄭彥棻八十年》，頁 7-8。
212 〈林以文團長聲明〉，《聯合報》，1952 年 1 月 24 日，第 1 版。

十、結　論

駐日代表團首任團長朱世明之子朱昌峻（Samuel C. Chu），於 1982 年在美國維吉尼亞州諾福克（Norfolk）舉行的關於佔領日本的學術會議上表示，韓戰爆發，美方沒有接受蔣介石派兵援韓的提議，「否則，在中國大陸已經敗給共產黨的時代任職，何世禮的工作甚至比他的兩位前任還要少」。[213]朱昌峻的想法，很大程度代表過往多數人對駐日代表團的印象——即 1949 年中華民國遷臺後，駐日代表團作用不大，甚至形同虛設。本文則指出，駐日代表團在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到 1951 年 7 月戰爭進入僵局階段，在接觸麥克阿瑟與遏制留日華僑左傾思想兩件事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何世禮多次把握機會遊說麥克阿瑟支持中華民國軍隊參與韓戰，儘管麥克阿瑟深有此意，但最終遭到華府拒絕。關於何世禮報告和麥克阿瑟交涉的電報，過去幾年已受學者注意，然〈何世禮日記〉可進一步提供一些關鍵細節。例如，何世禮對臺北方面多次催促其與麥克阿瑟溝通相當反感，認爲大局已對臺灣有利，若操之過急，反倒讓麥克阿瑟反感。同樣的情景，在 1952 年《中日和約》的最後交涉過程中再次上演。再如，透過何世禮日記與英國方面的史料，不難發現在韓戰初期，麥克阿瑟整整三個月未見英國駐日代表，卻多次接見何世禮，由此可見對臺灣問題的重視程度，也側面印證了英國對麥克阿瑟的不滿。[214]諸如這些細節，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了解蔣介石、麥克阿瑟、美國政府對使用中華民國軍隊參與韓戰的構想，以及韓戰期間蔣介石如何利用機會凸顯臺灣的重要性。透過與麥克阿瑟的密切聯絡，何世禮無形中提高了盟

---

213 Samuel C. Chu, “General S. M. Chu on the Allied Council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omas W. Burkman, e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MacArthur Memorial,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The MacArthur Memorial Foundation, 21-22 October 1982* (Norfolk, Va.: MacArthur Memorial Foundation, 1984), p. 33.

214 關於韓戰初期英國政府對麥克阿瑟的不滿，見 Peter Lowe, “An Ally and a Recalcitrant General: Great Britain, Douglas MacArthur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5:416 (July, 1990), pp. 624-653.

軍總部對臺灣的重視程度，很大程度上確保了 1952 年《中日和約》的順利簽訂。[215]

其二，韓戰爆發後，何世禮以強勢作風遏制左傾華僑分子的舉措，亦與盟總的政治需求不謀而合。如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公開支持中共代表周士第出任盟國對日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後，盟總即在何世禮要求下，查禁該會發行的《華僑民報》。何世禮亦耗費大量心力，要求華僑領袖作出擁護中華民國的政治表態，其中以林炳松最具代表性。何世禮上任團長時，關於林炳松親共的質疑已不絕於耳，何世禮起初對其採取容忍觀察態度，要求其以具體作爲宣誓擁護政府立場，林炳松亦多次表示絕對反共。但當林炳松擔任社長的大阪國際新聞社的政治表態遲遲不見改善後，何世禮徹底對其失去信任。爲此，何世禮改以較能信任的林以文，出任日本華僑總會會長，對於東京華僑總會會長，亦採取相同方式辦理。此一強勢手段，暫時穩固多數留日華僑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如葉公超在一場國民黨內部會議中發言，稱何世禮「反共意志堅決，對取締左傾分子不遺餘力」[216]；丘念台亦在 1951 年 9 月〈日本華僑政治活動近況〉報告中總結道：「今春四月，駐日代表團召集全日各縣市僑會會長開會，另訂章程，圖重新改組。六月中，全日華僑總會均分別改組完成，盡排共產分子，惟東京僑會，仍選出共黨多人，代表團不予承認。九月初，命令另行改選，致爭奪會所，幾鬥毆流血，幸得鎮壓交代。」[217]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於 1950 年 6 月 28 日任命周士第爲駐日代表後，周士第 7 月 27 日在重慶出席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218]10 月 23

---

215 李戡，〈何世禮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角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49（2018 年 5 月），頁 93-134。

216 「紀錄」（1951 年 1 月 8 日），〈駐日代表團人事〉，《外交部》，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02-19-04-007。

217 「日本華僑政治活動近況」（1951 年 9 月 28 日），〈石叟叢書－各方建議（包括報告）（下冊）〉，《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8-010108-00019-027。

218 〈標誌西南各民族各革命階級民主黨派的大團結．西南軍政委員會首次會議開幕．劉伯承主席致開幕詞指出減租問題爲會議中心議題〉，《人民日報》，1950 年 7 月 30 日，第 3 版。

日周士第被任命其爲解放軍防空部隊司令員。[219]由此可知，中共中央任命駐日代表之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然而，蔣經國對此卻深表擔憂，多次要求何世禮查明周士第的動態，而何世禮深知周士第絕無可能對其構成威脅，因麥克阿瑟早視蘇聯駐日代表爲眼中釘，且韓戰爆發後麥克阿瑟展開「紅色清洗」（Red Purge），清除日本共產黨之影響力。至此，中共代表在日本毫無活動空間，正如何世禮所料，自始至終周士第並未啓程赴日。蔣經國的態度，生動反映韓戰爆發後蔣介石對臺灣前途的不安與憂慮，時刻提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組織裡對中華民國代表發起攻勢。在此局面下，蔣介石更需充分把握韓戰契機，透過派兵援韓進一步提高臺灣在美方心中的價值。

219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下冊，頁 796。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案

《外交部》

〈日本僑務〉，館藏號 11-01-02-18-01-005。

〈有關日本政情資料〉，館藏號 11-01-02-02-01-070。

〈駐日代表團人事〉，館藏號 11-01-02-19-04-007。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圖書館藏微捲資料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s Office Files, 1945-1953 [microform], Part 4, Reel 2.

國史館藏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三）〉，典藏號 002-080200-00641-052、002-080200-00641-059、002-080200-00641-075、002-080200-00641-093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四）〉，典藏號 002-080200-00642-025。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五）〉，典藏號 002-080200-00662-055、002-080200-00662-082。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六）〉，典藏號 002-080200-00663-009。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七）〉，典藏號 002-080200-00664-037、002-080200-00664-042。

〈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二）〉，典藏號 002-080200-00427-054。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三）〉，典藏號 002-080200-00342-001

〈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一）〉，典藏號 002-080200-00344-035。

〈中央報告（二）〉，典藏號 002-080101-00029-017。

〈美政要來訪（五）〉，典藏號 002-080106-00056-001、002-080106-00056-003、002-080106-00056-004、002-080106-00056-005、002-080106-00056-010、002-080106-00056-014、002-080106-00056-015、002-080106-00056-016、002-080106-00056-017。

〈對美國外交（九）〉，典藏號 002-080106-00031-002。

〈對美關係（六）〉，典藏號 002-090103-00007-030、002-090103-00007-063。

〈籌筆—戡亂時期（十五）〉，典藏號 002-010400-00015-011。

《蔣經國總統文物》

〈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軍事將領談話紀錄（一）〉，典藏號 005-010205-00108-004。

《陳誠副總統文物》

〈石叟叢書—友聲集（第一冊）〉，典藏號 008-010108-00014-048。

〈石叟叢書—各方建議（包括報告）（下冊）〉，典藏號 008-010108-00019-027。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

《外交部》

〈台灣獨立運動（一）〉，檔號 A303000000B/0037/006.3/002/1/026、A303000000B/0037/006.3/002/1/027、A303000000B/0037/006.3/002/1/028、A303000000B/0037/006.3/002/1/030、A303000000B/0037/006.3/002/1/035、A303000000B/0037/006.3/002/1/039、A303000000B/0037/006.3/002/1/056、A303000000B/0037/006.3/002/1/058。

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一）》，新店：國史館，2001。

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二）》，新店：國史館，2001。

Foreign Offi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United Kingdom, FO 371/84044, 371/84099.

General CIA Records (The United States)

CIA-RDP79R01012A000300050005-7, CIA-RDP82-00457R005200700001-0, CIA-RDP82-00457R006200450009-9, RDP82-00457R007900010010-7.

United States Army, 8th, Korea, Psychological Warfare Propaganda Leaflets and Documentation Sheets, circa 1951, Preserved in East 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 Kore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二、日記

〈何世禮日記〉，何世禮贈予李敖，作者家存。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

三、報刊、雜誌

《人民日報》（北京），1950。

《大公報》（香港），1949。

《工商日報》（香港），1950。

《中央日報》（臺北），1950-1951。
《華僑日報》（香港），1950。
《聯合報》（臺北），1952。
《讀賣新聞》（東京），1949、1951。
Nippon Times, 1950-1951.
The Baltimore Sun, 1950.
The New York Times, 1950-1951.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1.

四、專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 9，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宋越倫編著，《日本華僑概況》，臺北：正中書局，1987。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3。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胡光麃，《波逐六十年》，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抗美援朝戰爭史（修訂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
張篷舟，《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冊 4，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陳伯中編，《鄭彥棻八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陳鵬仁，《日本華僑概論》，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日本華僑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5。
楊弘，《周士第將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楊國光，《一個台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
羅晃潮，《日本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Beloff, Max.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Berger, Carl. *The Korea Knot: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Burkman, Thomas W.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MacArthur Memorial,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The MacArthur*

Memorial Foundation, 21-22 October 1982. Norfolk, Va.: MacArthur Memorial Foundation, 1984.

Campbell, John Martin. *Slinging the Bull in Korea: An Adventure i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0.

Chang, David Cheng.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Clark, Mark W. *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 New York: Harper, 1954.

Collins, J. Lawton. *War in Peacetime: The History and Lessons of Kore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Cotton, James, and Ian Neary, eds.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Foot, Rosemary.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stings, Max. *The Korean War.* London: Pan Macmillan, 1988.

Hennessey, Thomas. *Britain's Korean War: Cold War Diplomacy, Strategy and Stecurity, 1950-53.*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Jager, Sheila Miyoshi. *Brothers at War: the Unending Conflict in Kore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3.

Lowe, Peter.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6.

MacArthur, Douglas.*Reminiscences*. Greenwich: Fawcett Publications, 1965.

Masuda, Hiroshi. *MacArthur in Asia: The General and His Staff in the Philippines, Japan and Kore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McGovern, James. *To the Yalu; From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Korea to MacArthur's Dismissal.* New York: Morrow, 1972.

O'Balance, Edgar. *Korea: 1950-1953*. London: Faber Press, 1969.

Pease, Stephen E. *Psy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1950-1953.*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1992.

Qing, Simei.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Rusk, Dean. *As I Saw It.*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1.

Schaller, Michael.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chnabel, James F., and Robert J. Watso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Joint History, 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98.

Sebald, William J. *With MacArthur in Japan;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Sheldon, Walt. *Hell or High Water: MacArthur's Landing at Inch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Stone, I. F.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Taaffe, Stephen R. *MacArthur's Korean War Generals.*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6.

Truman, Harry S.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Whitney, Courtney.*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6.

Y'Blood, William T., ed. *The Three Wars of Lt. Gen. George E. Stratemeyer: His Korean War Diary.* Washington, D. 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9.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五、論文及專文

王樂娜，〈台灣當局與朝鮮戰爭〉，杭州：浙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7。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臺灣史研究》，卷 19 卷期 2，2012 年 6 月，頁 151-192。

李馘，〈何世禮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角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49，2018 年 5 月，頁 93-134。

沈覲鼎，〈使日鴻爪（三）：對日往事追記之三九〉，《傳記文學》，卷 31 期 4（1977 年 10 月），頁 126-129。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45（2016 年 5 月），頁 193-250。

侯中軍，〈朝鮮戰爭期間台灣的應對及其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頁 70-86。

洪瑞鴻，〈美術救國：梁中銘反共漫畫研究（1949-196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孫宅巍，〈台灣當局與朝鮮戰爭〉，《社會科學戰線》，1990 年第 4 期，頁 220-225。

島田大輔，〈占領期《中華日報》《内外タイムス》の研究一九四六━一九五三（下）：一九五〇年代における《内外タイムス》の台湾進出〉，《メディア史研究》，期 42（2017 年 10 月），頁 112-134。

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戰後日本神戶華僑社會的變遷〉，《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2，2011 年 6 月，頁 147-195。

馮琳，〈朝鮮戰爭時期圍繞出兵援韓問題的台美交涉〉，《社會科學研究》，2020 年第 1 期，頁 167-179。

劉維開，〈蔣中正總統對韓戰及相關問題的看法與政策──民國三十九年〉，《近代中國》，期 137（2000 年 6 月），頁 90-100。

劉維開，〈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維鈞在韓戰初期中美外交中的角色〉，《近代中國》，期 140（2000 年 12 月），頁 39-57。

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輔仁歷史學報》，期 21（2008 年 12 月），頁 253-282，另收入陳立文主編，《蔣中正與民國外交 II》（臺北：中正紀念堂，2013），頁 39-73。

Lowe, Peter. “An Ally and a Recalcitrant General: Great Britain, Douglas MacArthur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5:416 (July, 1990), pp. 624-653.

Ho Shai-lai during the Korean War: Lobbying MacArthur for Chiang Kai-shek's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and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Lee Kan*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on June 25, 1950, and its progress had become a constant preoccupation for Chiang Kai-shek (1887–1975), who had been seeking an opportunity to counterattack Mainland China after being defeated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1949. Chiang's plan was to dispatch three divisions of troo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Korean War and, after South Korea won, to further attack the Chinese Mainland, retaking the territories he had lost. General Ho Shai-lai (1906–1998), the newly arrived head of the Chinese Mission in Japan, was empowered to persuade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to accept the offer. While this plan was rejec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never come into effect, Ho had cultivat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 The year 1950 proved pivotal for the survival of Chiang Kai-shek's regime,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lso made the "emancipation" of Taiwan one of its major objectives. Undoubtedly,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bailed Chiang out, but there were other struggles contributing to this temporary vict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 Shai-lai's efforts to lobby MacArthur for his support, compete with the CCP for the Chinese seat in the Allied Council for Japan, and secure support from overseas Chinese based in Tokyo.

Keywords: Korean War, Chinese Mission in Japan, Ho Shai-lai, Chiang Kai-shek, Douglas MacArthur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